

新中国综合症

1979-2005年红色资本主义的早期崛起

Len Bracken

中文自由流通版

版权与版本说明

英文原著版权 © 2006, 2017 Len Bracken。英文第二版由 Backbone Books (Arlington, Virginia) 出版。

本书照片均由作者拍摄。

本中文电子版供自由流通与阅读。英文第二版中已经失效的邮政信箱地址已删除。

本版将译者注与作者的编号注释区分；照片按1979、1995、2005三次旅行集中编排。

目录

献给丽媛	iv
译序：道可道 非常道	v
第二版序言	xii
作者序言	xiii
引言	1
一、增长翻两番；红色资本崛起；工人饱受苦难与死亡威胁	13
二、产能过剩引发的环境噩梦	21
三、社会肌理的撕裂	27
尾声：关于赤壁、武汉与阳朔的评述	40
1979—2005年大事记	50
图片集：1979/1995/2005	60
注释	125
精选参考文献	135
索引	138

献给丽媛

译序：道可道 非常道

无名

“1968年五月的法国，那居高不下，曾令专家们深感遗憾的自杀率，几乎降到了零。不过是一场大罢工而已，这个春天依然拥有晴朗的天空，因为几辆汽车被烧毁，而其余的汽车则因缺乏汽油而无法造成污染。每当下雨、当巴黎上空阴云密布时，切记这都是政府的错。异化的工业生产带来阴雨，而革命带来晴空。”

开篇这段引文选自居伊·德波（Guy Debord）1971年的短文《生病的星球》（La planète malade）。其中“异化的工业生产 Alienated industrial production”是指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人类劳动和生产完全脱离了人的本质需求，反而转变为奴役人类与破坏自然的异己力量。如何对抗这种异化的工业生产，他寄望于类似法国“五月风暴”的大罢工，情境主义者将其视为拯救异化生活、重塑自由共同体的一场短暂革命实验。

这段充满了情境主义标志性的讽刺、反判与激进批判的语录极易引起被压迫者的共鸣，“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在1964年说道。如果穿越到1968年五月的法国，去亲眼见证这场现代欧洲史上规模最大的全国性抗议、罢工，看到法国青年和学生们挥舞着《毛主席语录》（小红书），高呼反抗资本主义和官僚体制的口号，你会以为那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居伊·德波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定想不到有人会用他的这段话来形容“后毛时代“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中国，这让人们回忆起当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毛泽东严厉批评邓小平的那句：“走资派还在走”。

然而更意味的是，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周恩来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样，都曾经于1920年代在法国勤工俭学。在

法国期间，他们亲眼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社会的动荡、工人阶级的贫困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这彻底打破了他们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幻想。这段经历，不仅让他们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还赋予了他们国际化的视野以及务实救国的政治作风。

周恩来在留法期间，不仅考察了法国，还深入考察了英国的煤矿和工业区。他写下了大量关于欧洲工业、罢工和经济危机的通讯。这些观察对他后来执政期间提出“一五计划”和“四个现代化”蓝图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正是他的国际视野，让周恩来敏锐地抓住了法国戴高乐总统推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契机，成功实现了1964年中法建交。这是新中国同西方大国建立的第一个大使级外交关系，实现了中国对西方外交的重大突破。

邓小平在法国雷诺汽车厂和克鲁梭钢铁厂的做工经历，让他成为中共早期领袖中极少数亲身融入过西方现代大工业生产的人。这种早期记忆直接投射到了他50年后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中。

我们知道，不同于英国的“妥协递进”的民主转型，即通过保留传统框架并不断注入民主内涵，从而实现低成本的制度更迭，法国走的是“断裂重塑”路线，由于旧制度的僵化与极端对立，不得不通过一次次革命（1789年大革命、1830年七月革命、1848年革命、1870年巴黎公社等）打破旧体系，直到1875年第三共和国成立，才最终确立了稳定的民主共和政体。中国的情况更类似法国，民主转型之路异常艰难。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实行改革开放的1979年，这三十年社会主义实践让中国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没有市场经济，没有商品交换，一切资源都掌控在政府手中，所有生活用品都需要凭票供应，人民生活政治高压下，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中国人民再也不愿继续过那种每人每月二两肉二两油的生活了。

这本《新中国综合症：1979-2005 年红色资本主义的早期崛起》用翔实的史料，通过作者亲身经历的三次中国之行，感受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社会在转型期间面临的严重问题。这段跨越二十六年的记录，仿佛病理切片，向世人展示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经历的阵痛——“综合症”。但从另一个角度，放在整个中国历史背景下来考量，这二十六年是两千年中华文明史上最安定与富足的时期，没有之一。

即使在二十年后回望这段历程，人们记忆里更鲜明生动的应该是 2008 年的北京奥运会，那壮观隆重的开幕式，亮如白昼的烟花秀，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成果最生动的展现，是中国加入 WTO 后交给世界最美丽的答卷。

然而，盛大的开幕式，亦是盛大的闭幕式，绚烂如烟花，热闹过后是寂寞。

在金融与中国问题专家卡尔·沃尔特（Carl E. Walter）与罗纳德·豪斯（Ronald J. Howes）合著，于 2011 年首次出版的《红色资本主义：中国非凡崛起之下的脆弱金融基础》中（Red Capitalism: The Fragile Financial Foundation of China's Extraordinary Rise），他们找到了问题的根源。

其中提到 2005 年，作者认为，2005 年是理解当今中国金融市场的关键年份——这一年标志着江泽民/朱镕基时代金融改革“最后一次大推进”的终点。此后，股票、商品和债券市场虽然仍在运作，为中国赢得了 WTO 意义上“市场经济”的表面光环，但 1998 年启动的改革始终未能真正完成，使中国的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始终处于脆弱状态。银行改革削弱了财政部对建行、中行的投资地位；商业票据业务侵入了发改委对企业债的管辖领域；向外资出售证券公司控股权则直接挑战了证监会的地盘。媒体甚至开始称汇金为“金融国资委”，而央行

还提出设立“超级监管机构”整合银行、证券、债券市场监管权——这等于中央监管部门的权力都下放到央行。

由于周小川的改革在制度设计上”跨部门、集权化”的，必然会引发既得利益部门的联合反弹；而恰恰在 2005 年，能够压住这种反弹的两位政治靠山（江泽民、黄菊）同时”退场”，权力真空之下，官僚体系的自我平衡机制迅速把改革拉回了碎片化的常态。

随后的中国经历了 2008 年的金融海啸。在雷曼兄弟倒闭之前，中国的银行、资本市场改革一直是照抄美国模式——花旗、大摩、高盛被视为金融实践与智慧的巅峰。但雷曼倒台、美国金融体系近乎崩溃，让这套”参照系”瞬间失去了信誉。问题是，美国模式垮了，但中国自己并没有准备好新模式，于是银行”突然失去了约束”，一边疯狂放贷，一边抢夺各种金融牌照——作者形容这更像是”退回到 1980 年代末、1990 年代初苏联式计划模式的翻版”。

但令金融专家们始料不及的是，随后地方政府为了推动城市化和获取建设资金，主动选择了以土地出让、土地金融为主导的“土地财政”模式。这种财政政策将土地资产化，作为信用背书去撬动银行贷款，进而催生并支撑了长达二十年的房地产经济大繁荣。

比起枯燥的理论分析，这本二十年前写成的《新中国综合症》，用生动感性的笔调再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曲折历程。看着画面中的芸芸众生，挣扎在尘世里的身影，同情油然而生。那种世事无常的命运无力感，挥之不去。1979 年的中国，中美建交，建立深圳、珠海、厦门、汕头经济特区，正式开启对外开放。人民在满怀希望开启新生活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面临的是“血汗工厂”、“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代价将由他们来承受。1997 年，举国欢庆香港回归，但没有人料到，二十年后，“一国两制”名存实亡，香港也失去了“东方明珠”的光彩，不再是大家趋之若鹜的“购物天堂”，大批香港人选择移民离开。2005 年的街头民众，镜头里他们或平静或高

兴，但不会想到他们正走在成为“房奴”的路上。决定他们命运，操纵他们生活的那只“权力”的大手，若隐若现，翻云覆雨。古人云：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作为一个曾在中美建交伊始就来到中国访问的美国人，本书作者对中国文化抱有极大的好奇与热情，对中国式权谋斗争、权力交替印象深刻。游览赤壁是令作者难以忘怀的经历，《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精彩绝伦。然而历史的真相要比演义残酷得多，东汉末年到三国鼎立，不仅是英雄辈出的史诗，更是华夏历史上最黑暗、最残酷的灾难。从东汉巅峰（公元 157 年）时期的 5648 万人到三国巅峰（公元 280 年），魏、蜀、吴三家人口加起来仅剩 1600 多万，全国人口锐减 70%。这样的人口大灭杀，在中国 2000 多年的历史发生了 14 次，其中“人相食”的惨剧屡见不鲜。

中国历史经历了长期的群雄割据、改朝换代以及极其残酷的宫廷政治，其中权谋必不可少。中国人最为津津乐道的“三十六计”在《三国演义》中都能找到鲜活的例子，除了书中提到的“蒋干盗书”——“反间计”，还有著名的“美人计”——王允借貂蝉离间董卓、吕布，最终除掉董卓；诸葛亮用“空城计”，让司马懿退兵；周瑜和黄盖设“苦肉计”，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诱使曹操上当，最后获得赤壁之战的胜利。这些都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将“兵不厌诈”演绎得淋漓尽致。

《三十六计》深受《易经》和老子道家思想的影响，充满了物极必反、阴阳转换的辩证法。它告诉人们，眼前的危机可能是转机，表面的优势也可能是陷阱。本意是劝导人们顺其自然，适可而止，是一种生存智慧和政治哲学。然而，兵家和谋略家在吸收这些思想时，进行了“工具化”的改造，从被动顺应发展为主动利用。当哲理被简化为具体的、追求绝对胜负的操作指南时，它就从形而上的“天道”变成了形而下的“权术”，将“有智慧”等同于“会算计”。

以《三十六计》为代表的东方谋略文化，与西方推崇的契约、法律和程序正义，恰好构成了人类文明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博弈范式，这也是中国人可以为了权力不择手段的文化根源。在传统中国，儒家思想是官方正统。儒家在台面上强调“仁义礼智信”，排斥阴谋诡计，认为那是“小人所为”，但在实际的政治和利益博弈中，儒家的仁义往往流于表面。这就导致了中国文化中“儒表法里”或“阳儒阴道（兵）”的现象。

面对权力的肆意妄为，本书作者凭借近乎直觉的本能，对“道家”的“无为”推崇备至。道家创始人老子希望君王能减少贪欲和过度的政令。统治者“无为”（不折腾百姓），百姓反而能自然顺应规律，达到“无不为”（什么事都办成了）的效果。其后的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由于他生活的战国中期，生活更加残酷。庄子发现普通人根本无法决定政治，于是他把“无为”带入了个体的精神世界，让人放下执念，顺其自然。

不幸的是，道家的处世哲学从来没有被中国人实践过，它只是作为一种理想成为中国人向往的美好。这就不难理解，道家思想会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灵魂之一。如果说儒家思想奠定了中国文学“文以载道”的社会责任感，老庄思想则为文学注入了超越世俗的审美情趣、自由的精神境界和灵动的艺术想像。盛唐时期浪漫主义文学巅峰的代表人物李白，被称为“诗仙”，其诗作中飘逸洒脱的气质、对仙境自然的描摹，无不渗透着庄子的逍遥意趣。宋代文人苏轼，其词与散文，如《前赤壁赋》中对天地变化的哲理思考，“自其变者而观之……自其不变者而观之”，直接取材于老庄的齐物观与变化论。

当李白登上黄鹤楼，面对崔颢写的《黄鹤楼》——这首被誉为“唐人七律之首”的大作，他留下“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慨而搁笔，充分体现了老庄思想里“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他对权力的抵抗也是道家式的“无为”，他写道：“安能摧眉

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直接对应到三十六计里的最后一计：走为上。

在居伊·德波赞颂用“大罢工”来对抗“异化的工业生产”五十五年后的今天，中国年轻人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现实——天文数字的房价；常态化的 996 工作制；学历贬值，毕业即失业的就业形势。万般无奈的年轻人选择了“躺平”——“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孩子”，以此来反抗巨大的生存压力和激烈的职场竞争，这与《新中国综合症》中的“大休息 Big Rest”不谋而合，从而使该书带有了预言性的色彩。这本书的一大亮点是拍摄于 1979 年的大量照片，在相机还不普及的年代，相关的影像资料弥足珍贵。我望着照片里的同胞，既熟悉又陌生。1979 年-2005 年，短暂的 26 年不过是一代人的时间。出生于 1979 年的中国人，可能是出生于 2005 年的年轻人的父辈，他们那时刚刚睁开眼，开始看世界，百废待兴，一切欣欣向荣。那时连西单墙也不仅仅是一堵墙，而是一条表达心声的“言路”。那时的他们没有料到在资讯发达的今天，表达心声的网络入口处却耸立着真正的“高墙”——防火墙；更没有料到他们的孩子会在今天宣告：“我们是最后一代！”

我们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呢？

希望通过重温这本书，和大家一起回顾自 1979 年以来，新中国筚路蓝缕的每一步。中国人曾经离“道”那么近那么近，然而如梦似幻，转瞬即逝，“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第二版序言

本第二版在排版过程中仅作了有限修订。增加了一些照片，删除或重新安排了另一些照片，并补上了图片说明。正文只作了少量编辑；此前因网站变更而丢失的带附加符号字母也已恢复。2015年，我因报道工作涉及对华贸易政策而获选参加一个新闻交流项目，但由于客观情况未能成行；原计划访问三座城市，这本可以让我把本报告更新到更近的时期。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本版收录了我1995年与 M ilun Chow 前往香港时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在第一版中并未注明拍摄于1995年。

（本页根据英文第二版原序言译出。）

作者序言

本文撰写于2005年11月，其节选版本发表于2006年伦敦期刊《辩证原理》第二期。谨向该刊编辑部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的鼓励与建议。尽管有部分编辑不愿署名，但我仍然要向本·培根、艾伦·格劳巴德、松娅·科特利茨卡、迈克尔·斯图尔特、D. A. 史密斯及迈克尔·扎罗尼表达感谢。特别致以最深谢意的是劳拉·萨利斯伯里、克里斯蒂娜·伯蒂斯及玛格达莱娜·M，感谢她们的精读与宝贵建议。

“1968年五月的法国，那居高不下，曾令专家们深感遗憾的自杀率，几乎降到了零。不过是一场大罢工，这个春天依然拥有晴朗的天空，因为几辆汽车被烧毁，而其余的汽车则因缺乏汽油而无法造成污染。每当下雨、当巴黎上空阴云密布时，切记这都是政府的错。异化的工业生产带来阴雨，而革命带来晴空。”居伊·德波，《生病的星球》第三节 1

引言

将生命转化为商品本身就是一种致命的行径，而在当代中国极端的市场环境下，这种现象的危害尤为严重。“红色资本家”利用各种材料——从死刑犯唇部提取的胶原蛋白²，到从西方随意回收的电子废料——作为其疯狂过剩生产的原料³。

席卷全球的中国商品，源自一个冷酷无情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低薪劳工（包括儿童和囚犯）长时间劳作，往往每周工作六到七天⁴。

面对农村地区的大规模失业以及向城市涌入的庞大无户籍移民群体（即所谓的“流动人口”）⁵，许多不幸的中国人陷入了孤立无援、与万物抗争的艰难生存状态。被拐卖的儿童沦为牟利工具⁶，而拾荒者则觊觎着一切，甚至连长城上的砖石也不放过⁷。

儒家思想与社会主义道德准则已让位于公开且猖獗的性产业；在一些全球最大的购物中心里，女性竞相将自己作为商品出售，以换取其他商品。⁸ 自杀率急剧上升，已成为18至35岁人群的首要死因。⁹

城市空气污染引发的呼吸道疾病每年导致超过50万人过早死亡，¹⁰ 而有毒废物的排放则在农村地区引发了抗议污染的骚乱及占领行动。¹¹ 以产值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家禽业为例，污染问题与该行业唯利是图的运作模式滋生了一种致命的禽流感；这种病毒不仅威胁着全球人类的生命安全，还迫使人们不得不大规模扑杀禽类。¹²

人们深知，在危险甚至往往致命的条件下过度劳作会增加死亡风险，¹³ 因此，他们有时也会设法抵制或逃避这种植根于“新中国”核心的、致命的“商品化”处境。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摄影纪实作品《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From One China to Another）14 从多个角度记录了 1949 年的革命，呈现了冲突双方的景象。他的镜头敏锐地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其表现力远胜于文字。尽管 1979 年不像 1949 年那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我还是在这一年带着相机造访了中国。当时，“北京之春”和“民主墙”运动刚刚兴起，随即又在党的指令下遭到镇压。除了游览首都，我还攀登了泰山，并考察了工业城市济南——重点参观了那里的纺织厂和重型机械厂、专门培养青少年的体育训练基地，以及附近的一个农业公社。

我 2005 年的中国之行（足迹遍及香港、澳门、深圳、赤壁、武汉、桂林和阳朔）印证了外界的报道：过去二十六年间，中国发生了一场经济革命，其重要性足以与二十世纪中叶发生的政治变革相媲美。

中国的主要水道为我的远足旅行提供了一定的地理背景——同时还涉及到了中国六大区域中的三个区域、23 个省份中的几个省以及四个直辖市。

纵观中国沿海地图，可见北部的黄海向南依次连接东海、台湾海峡与南海；而在地图上虽不那么显眼、却至关重要的，则是黄河、横贯中国中部的长江以及南部的西江。我的旅行主要在华北、华东和中南三个地区。

河北，在汉语中意为“黄河以北”，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华北，中国首都北京，就位于河北省内，拥有众多历史古迹。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建有气势非凡的“明十三陵”，安葬了明朝十三位皇帝，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皇陵。（图片）

毗邻北京的直辖市天津，位于渤海最深处的渤海湾。孕育了华夏文明的黄河从青藏高原开始，从西向东流经山东省，贯穿省会城市济南，最后汇入渤海。渤海是中国的内海，通过山东半岛与黄海隔开。

--

尽管翻阅地图能让我更加清晰地重温往事，但时常令我梦回中国的是大明湖畔被雨水冲刷的柳树。

山东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东临渤海和黄海，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隔海相望。山东半岛向南延伸，与江苏省接壤。江苏省拥有黄海和东海的海岸线。

被誉为“五岳之首”的泰山，高 1545 米，位于山东省中部的泰安市境内。外国人常常与广东省的台山市混淆，后者位于华南地区的中南部。

中国第一大河流并不是黄河，而是长江，它也是亚洲最长的河流，发源于西部的青藏高原，流经中国内陆核心的直辖市重庆，继续穿越湖北武汉与赤壁。

长江最后一段穿行江苏境内，于第三直辖市上海汇入东海，该市与江苏、浙江两省接壤——上述区域均位于华东地区，南部的福建省亦属此区，其海岸线毗邻台湾海峡，与台湾隔海相望。

长江是重庆和沿岸城市的水源，包括被称为“千湖之省”的湖北。这些湖泊在《国家地理世界地图集》上一目了然，不过书中仍将赤壁市标注为古名蒲圻。湖北位于中南地区，是典型的内陆省份，与广东省相邻。

广东亦称广州府，拥有南中国海沿岸，其经济中心深圳毗邻香港——一个“特别行政区”，另一个“特别行政区”是近在咫尺的澳门，仅需乘坐短途气垫船渡过南中国海即可抵达。这座世界金融中心由香港岛、九龙与新界组成，香港岛和九龙之间是亚洲第一的深水良港——“维多利亚港”。

广东的西边是广西省，也属于中南地区，西江由桂江和浔江交汇而成。西江从广西经广东进入澳门附近的南海。

通过地图和进一步的研究，我才真正厘清了我桂林附近遇到的一段运河，那是建于公元前 214 年，全长 36.4 公里的灵渠。它向北连接长江水系的湘江，向南连接珠江水系的漓江，从而将长江和珠江两大流域连为一体，打通了中原与岭南的南北水上通道。

--

首先，容我插一句题外话：尽管当时中国共产党对言论表达施加了种种限制，但在 1979 年的那个夏天，北京却弥漫着一种难得的自由气息——那是一种在夜间灯火通明的街道上骑行的自由，身边簇拥着无数骑行者，且无需担心汽车的干扰。

当时，党已着手规划汽车的发展，如今北京的街头也确实已是车满为患¹⁵。然而，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正如照片所见，无论经济状况如何，人们骑的都是清一色的普通自行车。人们得以享受一些在其他情况下难以企及的体验，比如骑车约会：夏夜温暖的微风轻拂肌肤，仿佛在为随后的浪漫情事酝酿着前奏。

这里既无车流、污染之忧，也无需顾虑汽油问题。骑行带起的微风拂动着宽松的白衬衫与深色长裤，穿过凉鞋的镂空处——这身装束虽如制服般统一，却兼具舒适、平等与优雅之感。

我骑车驶入一条小巷；若在夜间，出于谨慎，我绝不敢只身步行涉足此地。远离主街后，只见数百名居民伫立在阳台与台阶之上。他们肩并肩地聚在巷道两侧，构成了一群沉静的人潮，展现出一种强大的生命力量——历史证明，这股力量的走向往往变幻莫测。这种有生力量有时也会抗议，不服从党的指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都会响应党的号召，甘愿为工业生产和消费做出牺牲——无论这些政策是来自国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社会主义消费者和西方风格的广告一同出现在中文版时尚杂志《Vogue》的页面上。从 1979 年到 2005 年，纯粹的国有资本逐渐让位于一种新的混合体——“红色资本”，而那些拥有党政或军方背景的人士则从中获益颇丰。

这种从国有体制向私营企业体制转变的经济转型所带来的环境后果及收入分配不均，是引发每年数以万计抗议活动的怨气根源。

16

然而，从根本上讲，这种破坏性的变化肇始于诱人的商品化，正是这种商品化将中国大陆变成了世界工厂-超级市场，类似 1997 年回归前的香港。不过由于大陆缺乏高效而严厉的英国官僚，情况比我在 1995 年见到的香港更加严重。

然而时至今日，2005 年，香港人都跑到大陆寻找机会，而不是相反。

政策转型

“四个现代化”——即涵盖农业、工业、国防及科学技术领域、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政策目标——是由周恩来于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的；该计划的实施曾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受阻，最终由邓小平负责落实这些宏伟目标。

1975 年 1 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最后一次呼吁实施这一计划；一年后，他因癌症逝世。他的逝世引发了 1976 年 4 月的“天安门事件”，当时北京有两百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既是为了悼念周恩来，也是为了声讨“四人帮”——正是这伙人主导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种种胡作非为。“四人帮”在针对周总理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将周的文章污蔑为“大毒草”。

“天安门事件”后，主席毛泽东将矛头指向了邓小平，他被指控策划了这一事件。在中央政治局的支持下，他剥夺了邓小平的职务，将其授予了华国锋。

毛在 1976 年的新年致辞中还在警告不要追求物质上的进步，不料 9 月他就与世长辞。这直接导致继位者权力斗争的白热化，一边是毛的遗孀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另一边是党内元老支持的华国锋。

华国锋忠于毛主席，如果他们在追求权力的路上没有与他作对，他可能也不会反对“四人帮”。1976 年 10 月，他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并控制了该党，果断地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在随后的 1977 年，重新出山的邓小平在党代会上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政方针。然而华国锋为了保持对毛主席的忠诚，继续执行“两个凡是”的方针政策，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

1978年11月，长达一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爆发，数千人在北京西城区西单大街的砖墙上张贴“大字报”，争取民主、自由和人权，这让老一辈的人想起了“天安门事件”。

此时，党内元老们并不认为华是能领导国家走向未来的合适人选——他们转而支持邓小平。1978年12月，邓小平掌握了党内领导权，并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正式启动了“四个现代化”计划。

除了宏伟的“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外，1978年还公布了一项“十年计划”，在没有私营企业的情况下，发展七个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和天然气、煤炭、电力、铁路和水运。

第二年，1979年，有人向我介绍，山东省省会济南红星公社第五队的村民拥有自留地，可以饲养鸡和猪，并在市场上出售。还有一些特许经营，但私营企业依旧罕见。

“十年计划”将进行修订和调整，但到了八十年代，中央已经将经济的大部分控制权交给了市场。到我2005年出访时，随着如此多的国有资产私有化，私营企业已经占到经济总量的60%。¹⁷ 尽管美国仍然不承认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背景下的市场经济地位，但其他国家却承认。¹⁸

在新的市场体系下，中国共产党高度关注资本的需求，却鲜少顾及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人们深陷超长工时的泥潭，甚至在那种极具诱惑的消费狂热中，因过度劳累而丧命。

虽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点我将在下文详述）¹⁹，但民众的生活依旧堪忧。据估计，每天有1.9亿人饮用“有害污染”的水²⁰，每两分钟就有一人自杀。²¹

另外，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购物中心，而且计划兴建更多的购物中心，以满足西方的广告宣传诱发的日益增长的国内需求。²² 1979年，我登上泰山的7000级石阶时，还不知道中国有一句话叫“有眼不识泰山”，用来形容一个人的无知与傲慢，就像一个

--

老板无法想象工人只需迈步前行便能走出一条新的道路——一条通向门外的路；而他们走出去时，正带着庄子所谓的“心静”，以至于“整个宇宙投降”。

我夜宿的碧霞寺，又称青云寺，位于最高峰附近，由12座建筑组成，于公元1008年巧妙地建在石质山坡上——据说是道教建筑的一个参照典范。我们像僧侣一样睡在水泥地面上，清晨又跟随他们前往山峰东侧观看日出。

我向你保证，那里没有广告牌。这段精神体验后来在我心中与亚洲女性世俗的一面以及我对道教的理解完美地对应起来——日出与日落的红色光辉，最肥沃土地的黑色。

追求和谐

2005年时的领导人——国家主席兼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倡导建设“和谐社会”²³。然而，在一个5%的人口掌握着50%银行存款的社会里，他们的构想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着尖锐而令人痛心的矛盾²⁴，教他们如何追求和谐呢？

人民群众以生命为代价创造了新中国，他们坚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现实比理想残酷得多，根据2004年统计数据，有6000名矿工因公殉职²⁵。在全球各地区中，中国的工伤死亡总人数位居首位²⁶

这种对繁荣不懈且充满风险的追求，最终服务于资本及其积累——既包括国家自身的资本积累（例如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政府出人意料地干预股市以打击投机者），也包括许多共产党官员在内的特定精英群体所积累的资本。

因此，当我在办公室会见激进派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人称“长毛”）时，他使用了“红色资本”这一说法，以此指代由党员积累的资本。²⁷

他的外表和办公室都显得格格不入。与这座安保森严的政府大楼内其他办公室不同，他的办公室里挂满了宣传标语和横幅，其中一条白底红字的横幅写道：“心安命安无悔，虽历艰辛志坚。”

--

他留着长发，身穿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在这座禁烟大楼里抽着自卷烟；最重要的是，他在九龙贫困地区拥有大量支持者。对于北京方面运作的那个总体上运转顺畅的政治机器而言，他就像是一个发出叮当响声的松动零件。

他最近采取的行动是要求对2005年去世的赵紫阳给予认可——赵紫阳曾是一位高层官员，因在1989年天安门抗议活动中同情学生而失势。这一行动引发了“民主派”阵营一场戏剧性的抗议，导致香港立法会历史上首次陷入停摆。

在“长毛”看来，革命者的角色既可以是起义式的，也可以是立法式的。他正推动北京方面允许就该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职位举行全民公决，让市民对经由8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投票选出的人选拥有最终决定权；该选举委员会是一个根据《香港基本法》经选举和推选产生的团体及个人组成的选举团。

近期局势发生变化，香港航运业大亨董建华将行政长官一职移交给了曾荫权爵士。曾荫权是个唯唯诺诺的“顺从者”，且喜欢用电影情节做比喻；他曾有一句名言，将香港的财政状况比作电影《本能》中的莎朗·斯通，意指其“一丝不挂”。

历史遗留问题

谁该对强大的红色资本的迅速崛起负责任？大多数人的目光都转向了邓，他在20世纪80年代巩固了党内官僚体系中的权力，并亲眼见证了其改革措施在90年代得以落实。

中国人民可能依稀记得1977年至1978年他对“北京之春”的支持，当时对言论的管控有所放松；而对于他随后在1989年镇压天安门广场抗议者这一行径，人们或许则试图将其遗忘。

人们将他与市场改革和经济繁荣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些变革使中国在世纪之交变成了一个贫富高度分化社会。

清华大学教授汪晖认为，邓小平确立的体制属于“市场极端主义”¹，在这种体制下，党致力于推动某种特定形式的资本主义式榨取，并由此引发了令人警惕的后果。²⁸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 2005 年 4 月发生在华西 29 和泽国 30 针对化工厂的致命反污染骚乱，以及同年 8 月浙江省发生的一起针对某电池厂的抗议事件——该厂排放的有毒铅物质导致数名儿童死亡，并使无数儿童遭受了不可逆转的伤害。³¹

在清水河沿岸数家矿山和工厂被捣毁后，下潮水

(Xiachaoshui) 的一位农村劳工领袖表示，如果中央政府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会再等上一阵子；如果问题仍未解决，我们就会捣毁更多的工厂。”³²

如果说毛泽东对“文革”（1966-1976 年）的疯狂和由“大跃进”（1958-1962 年）引发的大饥荒这样的社会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对邓小平则不能只宣扬他的现代化建设给社会带来的繁荣，而避而不提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阶级冲突和消费主义这些恶果。

虽然党员仍然被要求学习“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位党内官员向我透露，前者在大多数具有商业头脑的同志中已不再受青睐。有趣的是，这位官员指出，佛教的影响已渗透进党内队伍，甚至在那些依然尊崇毛泽东的人当中也能见到这种倾向。在现代化进程飞速发展的当下，人们渴望复兴古老传统以寻回那份已然丧失的安定感，这种心态不难理解。长期以来，儒家的社会道德观念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着一种无形却无处不在的影响力；然而到了 2005 年，这种传统氛围却让位于网络性话题的泛滥、按摩院的兴起以及接连曝光的集体淫乱丑闻，³³ 令人感叹“人心不古”。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发生在这一年秋季的一起事件：一群日本男子特意选在“九一八事变”（1931 年日本侵占中国东

1 此处用庄子《逍遥游》里的鲲鹏展翅的意象会更加贴切

北) 纪念日前后来华，竟通过与中国妓女寻欢作乐的方式来“纪念”日本当年的侵略行径；此外，2005 年夏季在长城发生的一起涉及当地人与西方人的聚会式集体淫乱丑闻，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34

享乐主义者的回应。

在中国三大哲学传统——佛教、儒教和道教之中，道教的哲学洞见最常伴随着我；这种陪伴源于我对让-弗朗索瓦·比莱特 (Jean-François Billeter) 那本小书——书名谦逊地定为《庄子之课》(*Lessons of Chuang Tzu*)²——中关于“姿态”的研读。35 庄子的道教思想伴随着我来到了赤壁，这是一个位于湖北省中南部的繁华小镇，旧称蒲圻。当我笨拙地跪在道观里，模仿祈祷的姿势时，我的中国朋友们都笑了。我没有真正祈祷，因为我不信教。

作为写过“辩证享乐主义”小册子的作者，36 我确实倾向于用道教的观点来思考 1979 年至 2005 年间发生的事情：1978 年之前，工人因处于静止状态而积聚的“气”，在随后疯狂的劳作中得以释放——这反映了一种“静”与“动”的辩证关系，而这种关系终将回归于“静”，这或许会通过一场围绕“大休息” (Big Rest) 理念的大罢工来实现。

根据我的辩证享乐主义理论，运动也好，静止也好，无论哪种存在方式，皆是“痛并快乐着”，两者融为一体，相互转化。它具有享乐主义者追求的那种有规律的劳逸结合，而非死亡与劳作。许多中国人内心深处都明白，必须拥抱休憩带来的快乐，否则便难逃因过劳、职业病、环境污染或自杀而走向终极的“安息”的命运。

2 汪晖将中国改革开放置于全球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 与资本主义扩张的脉络下，提出了对邓小平时代以降“市场化改革”的批判性重构。

此外，中国那高达 13 亿的惊人人口数字也表明：尽管中国人在残酷的劳动力市场上作为“商品”做出了种种自我牺牲，但他们对肉体享乐的追求，依然与对劳作之苦的承受不相上下。

然而，1979 年至 2005 年间，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一次深刻的蜕变。1979 年，在济南红星公社第五队，当我的向导唤醒那些在树荫下休憩的农民时——他们那种“懒”是保尔·拉法格在《懒惰权》一书中所肯定的那种积极意义上的“懒”³⁷——如今，这些人早已变得终日劳作、甚至不惜透支身体了。

我推测，当年那些衣着体面、在黄河附近立交桥下悠闲地看着火车驶过的人，如今至少也已变成了勤勉劳作之辈。

除了湖北省一位频频停工休息的挖沟工，以及澳门某公园里歇息的一位退休老人之外，我在 2005 年几乎看不到什么懒散之人。到处都是像工蜂一样辛勤劳作的身影。

1978 年的党中央指令释放了中国积聚已久的能量，或“气”；但这项指令缺少毛泽东——或者更准确地说，庄子——那种切合实际的警告：不要迷失于物的世界之中，而人往往容易如此。³⁸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国就有了这位深谙“自然之道”的道家哲人庄子；他反对人在外物中异化自我、损害自身的主体性，反对任由外物把人也当作物来对待。

官僚对庄子《逍遥游》一文的警示浑然不觉，更遑论卡尔·马克思对“拜物教”的批判，因为他们习惯讲抽象的大道理——而无法体会那些付出艰辛劳动、挣扎于失业与贫穷的劳苦大众的困境。邓希望社会主义通过为世界生产商品而致富。然而，他及其继任者的政策导致中国人口大规模丧失对市场的自主权，导致人类主体沦为生产要素和消费数据统计的组成部分。

这种对中国运“气”的否定，即 1979 年以来的生产过剩和最近的消费狂潮，³⁹ 终将通过某种形式的动荡，或者更好的方式——“休憩”，来加以克服；这种休憩最好是令人愉悦的，而非

那种极有可能降临的、作为终极休憩的死亡。在此之前，“红色资本”将继续为主人创造更多价值，并毁灭更多奴隶的生命。

种种迹象表明，红色资本帝国将用商品和污染扼杀地球，其规模之大，以至于就其对世界历史的后果而言，可能会超越历史上所有帝国曾经的生产总量。

世界各地的消费者乐于沉溺于这条“巨龙”的诱惑，毫无愧疚感地大肆消费其商品——这正如 19 世纪香港的鸦片瘾君子们吸食鸦片时，令其帝国主子感到欣喜一样。当年，只有四分之一的中国男性沉迷于这种被英国人坚称“无害奢侈品”的毒品。

如今，几乎每个人都对廉价的中国商品产生了依赖；这些商品往往因消费安全标准低劣而危害健康，而其中的电子设备更是以种种惊人的方式侵犯着消费者的隐私。

一、增长翻两番；红色资本崛起；工人饱受苦难与死亡威胁

尽管尼克松于1972年访问了北京，但直到1979年中美才正式建交；此后，外国投资者开始尝试适应，京剧演员那刺耳的唱腔。中国的统计数据往往难以捉摸，但根据中央情报局（CIA）发布的《世界概况》（World Fact Book，2005年版），在1979年至2004年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翻了两番；在过去二十年里，主要受出口部门推动，其增长率一直保持在近10%的水平。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GDP总额在2000年达到1万亿美元，并于2004年增至1.6万亿美元。⁴⁰

尽管2005年时中国还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而美国位居首位，但专家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占据主导地位。⁴¹

不过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购买力平价估算（PPP）法——即通过一篮子商品来计算GDP以消除货币汇率差异——进行估算，结果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PPP GDP为7.6万亿美元，而美国的这一数据为11.7万亿美元。⁴²

主张经济实用主义的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猫论”：不论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他确实释放了“资本主义之猫”，而中国已然成为一架巨大的“雄猫战斗机”——不仅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WTO），更形成了日内瓦贸易外交官们委婉称为“经济现实”的局面，即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拥有估计高达1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⁴³

若论谁最希望把这只猫“装回袋子里”，恐怕非其他国家的纺织工人莫属。随着WTO相关协议要求发达国家于2005年取消对华进口关税，中国今年的出口激增，主要由纺织品和服装（如T恤、胸罩、口袋衬布等）带动。以欧洲为例，仅2005年上半年就进口了1.815亿件中国产毛衣，而2006年的进口量预计将达到2亿件。

各类纺织品出口量纷纷突破配额限制，导致欧洲港口货物积压，引发了所谓的“胸罩大战”。这一现象也引发了人们的质疑：面对这个依靠近乎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包括数百万 16 岁以下童工及数十万劳改营囚犯）运转的“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怪物机器，世界究竟能消化多少由其生产的服装？⁴⁵

在这一体制下，中国官员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不同寻常的境地：他们试图放缓经济增长，甚至试图抑制出口的激增——2005 年 6 月的出口额较上年同期惊人地增长了五倍。⁴⁶

然而，由执政党引入的市场力量如今似乎已超出了其掌控范围；即便中国国内市场不断扩大，也无法消化如此巨大的工业产能过剩。

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经济虽然自 2003 年以来已出现过热现象，但其经济增长速度并未超过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的韩国或 80 年代的日本。不过，他们也承认，中国的体量如此庞大，以至于这场产能过剩危机所带来的后果难以估量。

红色资本崛起

经济权力正日益由党内官员与企业家、实业家及金融家——即所谓的“红色资本家”——共同掌握；这些人不仅与军队将领及党内人士关系密切，许多人本身就是这些组织的现任或前任成员。能源领域清晰地展现了“红色资本”的目标，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火热程度：目前的能源需求较 1980 年增长了 150%⁴⁷ 需求之大，以至于 2004 年有超过一万家工厂因电力供应不足而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并调整生产计划，将生产时段改至深夜班次。⁴⁸ 得益于国际贸易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的国有银行所提供的资金支持，中国能源企业已与安哥拉、澳大利亚、阿塞拜疆、巴西、加拿大、伊朗、哈萨克斯坦、沙特阿拉伯、苏丹、乌兹别克斯坦及委内瑞拉等国达成了石油交易协议。

2005年7月人民币升值，使得中国进口石油的成本降低；同时，受汇率升值影响，中国投资者收购西方企业（尤其是美加两国的能源公司）的成本也相应下降。

不同于在上世纪80年代疯狂投资美国房地产的日本人，中国投资者明智地收购那些从事实际生产的企业；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曝光了对石油资源的赤裸竞争以来，中国显然已将目光投向能源领域的交易。

乔治·W·布什总统在萨达姆·侯赛因身上兑现了尼克松在1973年石油危机期间对沙特王室所发出的威胁——用武力夺取油田。

中国投资者在意识到收购美国能源企业优尼科公司（Unocal Corporation）会引发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后，于2005年撤回了收购要约。与此同时，北京与莫斯科联手，反对美国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及其他地区的军事扩张行动，特别是美国在日本增兵，以及华盛顿和东京方面关于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的呼声。

为应对美国可能阻挠中国获取能源资源的举措，中国正在推行“珍珠链”战略，建立一系列延伸至中东的基地；其中包括位于巴基斯坦的基地及通往中国的输油管道，以及位于印尼、毗邻战略要道马六甲海峡的基地——中国80%的石油进口都必须经由此海峡运输。⁴⁹

尽管中国收购优尼科（Unocal）的计划曾遭华盛顿阻挠，但美国无法将中国排除在所有交易之外；最终，美国或许不得不任由这个“红色巨人”向世界展示如何积累资本——尽管这显得颇为矛盾，甚至可能引发阶级冲突：毕竟，一支号称属于人民的军队或一个共产党，竟然一手打造出了专家眼中“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经济与社会形态之一”⁵⁰。

中国利用来自国有银行的零成本、零风险贷款以及甘于做出牺牲的劳动力大军，既化解了国内危机，又在海外危机中获利。中国企业大胆收购海外破产公司，从而在这些企业的运营中掌握话语权，这充分体现了“红色资本”那种善于捕捉机遇的运作方式。

中国最希望的是继续向西方市场销售商品，因此除了台湾和能源获取等问题外，中方可能愿意向华盛顿方面的谈判对手做出让步。值得关注的是，西方是否会允许这些名义上是“共产党人”、实则是民族主义者的人，在国际舞台上与各方在平等的条件下参与资本博弈。凭借贸易优势，来自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等机构的能干官僚们已成为影响全球资本流动的一股主要力量；中国的投资额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 45%，且海外并购活动也大幅增加。⁵¹

根据美国财政部的估算，这些“红色资本家”确保了国家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截至 2005 年 3 月，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 6590 亿美元⁵²，这一规模仅次于日本，且每月都在以数百亿美元的速度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经济学家指出，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自 2003 年以来持续下降；尽管有不同的说法，但看来中国正逐步减少美元资产的持有⁵³——目前，美元资产在其外汇资产中的占比已降至 62%至 75%。⁵⁴

这种不愿继续为美国消费提供资金的态度，对于高度依赖信贷且债台高筑的美国社会而言，可能是一剂苦药——它不仅可能推高利率，还可能引发经济衰退。

美国经济前景中或许潜伏着一场全面的金融与货币危机——这场危机甚至可能像 1994 年墨西哥的“龙舌兰危机”或 1998 年至 2002 年阿根廷的“探戈危机”那样，被冠以一个带有某种节日色彩的名称。

另一种可能性是，危机将呈现出类似病毒的传播特性并迅速蔓延——正如人们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看到的。鉴于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角色，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会更大。

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哈佛大学校长兼前美国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位于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

——即“央行中的央行”——等机构，对美国的贸易与财政赤字敲响警钟。55

经济策略研究所（Economic Strategy Institute）的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认为，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可能引发对美元的抛售狂潮（即“美元挤兑”），而这个国家很可能是某个与美国经济利益纠缠较少、不像中国与美国那样联系紧密的国家。56 预测中可能会出现一场百威啤酒危机，这场危机将导致乔·西帕克（Joe Sixpack）的房屋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和油价飙升。

工人饱受苦难和死亡威胁

1949年至1979年间，在党“让中国强大起来”的号召下，中国人口翻了一番。57 这一政策的“成效”甚至有些过头了：1979年，当人口总数尚不足10亿时，党便开始实施备受争议的“独生子女政策”，甚至强制公民进行堕胎。58

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2005年7月中国人口达到13亿。然而，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估算数字却是15亿；这一巨大的估算差异——其差额本身就超过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凸显了中国人口规模之惊人。59

这种庞大人口规模带来的一个后果是，每年都有2000万新增劳动力涌入残酷的劳动力市场；这使得中国能够雇佣大量人力，而不像日本那样倾向于使用机器人。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为应对失业率上升，执政党开始鼓励灵活就业形式，如自谋职业、兼职和季节性工作。

如今，执政党公开提出要“引导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60，以适应新的就业形式。1978年时，中国尚无劳动者从事自谋职业或受雇于外资企业；而到了2001年，这两类群体的数量已显著增加（每万名劳动者中分别有2131人和345人）。

尽管 2001 年仍有 76% 的劳动者受雇于国有企业，但在 1978 年至 2001 年间，作为就业渠道，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就业人数下降了 37%，而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则增长了 10,080%。⁶¹

研究人员发现，在当前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市场环境下，雇主为追求更高利润而忽视了工作条件；此外，“当劳动者在竞聘工作岗位时，往往会出现过度工作的情况，或倾向于相互压价以争取到一份工作。”⁶²

一项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发现企业存在大量强制加班现象，并得出结论：延长工作时间的最普遍原因在于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在接受调查的三座城市中，不希望加班的劳动者达到了 43.2%，比希望额外工作时间或对此持无所谓态度的劳动者所占比例都要高。调查显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工作时长更长；就工作时长和作业环境危险性方面，建筑业属于最艰苦的行业之一。⁶³ 2001 年，中国公众震惊地得知，一名同胞因连续 226 天、每天工作 17 小时而死亡，成为首例被报道的“过劳死”案例。⁶⁴

此外，在工伤事故、致死及非致死性职业病以及因接触危险物质导致的死亡方面，中国的数字均超过世界其他所有地区。⁶⁵ 据报道，中国每年因工作相关原因死亡的人数超过 45 万。⁶⁶

与其他地方的劳动者一样，中国的劳动者也面临着职场暴力以及癌症、自杀等与工作相关的健康问题导致的死亡；更不用说还有许多与工作有关的呼吸系统疾病、循环系统疾病和传染病，往往未被充分上报

与其他地区的劳动者所面临的问题不同，中国的工作场所安全问题要严重得多。例如，2001 年有 102,606 名工人在工作中因接触危险物质而丧生。⁶⁷

尽管市场化改革已使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摆脱了绝对贫困⁶⁸（即日均生活费不足一美元），但工作场所的安全数据表明，这些工资增长往往伴随着严重的毒害风险，以至于人们最好还是敬而远之。

那些组织或参与争取劳工权益活动的人，以及许多其他人——包括所谓的“流氓”和“懒汉”——往往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强行带走，送去接受“劳动教养”。

这些囚犯（具体人数外界无从确切知晓）每天清晨五点起床，在营地从事各种劳作，同时还要接受旨在“洗脑”的强制教育，直到午夜方能休息。

“我们整天往河边码头搬运石头，晚上还要制作人造花，一周七天，从无间歇，”一位前囚犯回忆道。⁶⁹ 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境况比这更令人绝望：例如，在肮脏阴暗的地下监狱矿井里辛勤劳作时，还得被迫高喊那些陈腐的歌颂劳动的口号，诸如“劳动创造新生活”之类。

二、产能过剩引发的环境噩梦

到了 2005 年，人们对毛泽东及其思想，例如“征服自然，从自然束缚中获得自由”这一号召的崇敬之情已逐渐淡去，但他作为象征社会公正的图腾在人民心中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在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均矗立着他的雕塑。

尽管毛对自然持对立态度，但他仍组建了多个工作队，负责建造公共设施、开发自然资源以及那些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人迹罕至的道路——在那些道路上甚至可以进行稻米加工——这一点我在 1979 年于首都附近的道路上亲眼目睹。

那时，邓小平刚刚开始执政，人们的出行方式主要是步行、骑自行车或乘坐公交车。后来，奉行邓小平路线的人员充斥了官僚体系，并极有效地宣扬了他那句“致富光荣”的名言。

这些官僚推行的政策，使得到了 2005 年，街头已挤满了汽车，并推动国家走上了即将成为全球最大汽车消费国与制造国的道路。

70

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倾向催生了一系列被无数次效仿的商业行为，其核心目标是将经济增长置于其他一切目标之上。

出于私利而攫取或窃取公共资源——例如私自搬走本可防止水土流失的石块和树木——进一步加剧了由此引发的、本在预料之中的环境后果。

奥维尔·谢尔（Orville Schell）曾预言会出现一场生态噩梦——即土地荒漠化、环境污染以及整体生态退化——如今，这一预言已不幸成为现实。⁷¹

在湖北某处温泉景区，起初一切似乎都充满健康气息——富含矿物质的泉水、初绽的樱花树——但后来我得知，夜间可见的灯光实则来自路边的一座燃煤电厂。

而在另一端，大约一公里外，一座封闭的混凝土制造厂宛如幽灵般凝视着街对面那些被遗弃的房屋——昔日的居民为保全性命而逃离了那里的污染。

大多数中国人已不再对邓小平时期政策所引发的破坏视而不见。近期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95%的受访者将环境恶化视为一个严峻问题。⁷²

然而，尽管人们口头上主张必须立即治理污染，却也难以抑制对经济繁荣的追求。

在 2005 年，人们认为在市场中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应对污染带来的威胁——直到这些市场或污染威胁变得极其紧迫、令人无法忍受，以至于搬离住所或参与暴动成了理所当然的应对方式。

在最近一次中国行启程之前，我清楚地意识到，由于臭名昭著的“亚洲棕色云”，我再也无法像年轻时那样，在泰山高处目睹那绚烂夺目的日出了。

曾在 1995 年的晴空下波光粼粼的维多利亚港，如今已映照出灰绿色波纹间的雾霾。卫星图像显示，一层浓密的工业排放物覆盖着中国中部地区，在污染扩散的区域，地表依然处于半遮蔽状态，例如上海周边的海岸线一带。

卫星传感器还捕捉到横跨亚洲、延伸至太平洋直至夏威夷的大量一氧化碳羽流——有时甚至远达美国西海岸。

绿色 GDP

中共政策制定者曾计划推出一项计入环境成本的“绿色 GDP”指标，但截至 2005 年尚未公布任何成果。

世界银行估计，因环境污染付出的代价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8%至 12%，包括酸雨、失业、医疗保健和救灾造成的直接损失。⁷³如果中国要全面评估成本，他们还必须对空气中悬浮颗粒物引起的哮喘、二氧化硫引起的支气管炎和肺气肿所造成的痛苦进行价值评估，二氧化硫是一种容易辨识的物质，人们通常在街上就可以闻到它的味道。

2005 年，在毗邻香港的中国大陆新兴繁荣城市深圳正是如此，其工厂与超级商场的融和交织感比香港还要强烈。

我曾与一位医生交谈，他亲眼见证了深圳从一个小渔村蜕变为一个股票经纪人与庞大流动人口比邻而居的城市。我甚至看到一些流动人口深夜在网吧里穿着外套打盹。

如今，深圳及其周边地区几乎无鱼可捕——这是每年数百万吨污染物流入附近珠江口造成的后果。。

医生说，大多数居民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汽车一氧化碳和铅污染的困扰。此外，在中国各地，数百万人因高浓度臭氧而出现咳嗽、胸痛、喉咙和眼睛不适的症状。

邓小平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在三次政治清洗中幸存下来，他常幽默地说“天塌下来砸不到矮子”，但他错了：它砸在了追随他的人民身上，无论高矮胖瘦。

政府的应对措施

值得肯定的是，现任领导层已经承认中国正面临生态危机。国家环保总局（SEPA）副局长潘岳指出，“先发展后治理”的观念是“绝对错误”的，因为它增加了后续治理的难度。

他预测：“如果污染增长的势头不改变，到2020年，污染总量将翻两番。”⁷⁴ 国家环保总局已开始关停部分高污染企业（如金矿和造纸厂）⁷⁵，并着手追究那些包庇污染企业的官员的责任。

在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且污染治理权并非由北京直接掌控的国家，有效的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着诸多执法障碍。例如，在首都以外地区，国家环保总局工作人员的薪酬由地方政府发放，因此他们很容易受到地方官员的阻挠，难以深入开展调查。

潘副主任正确地指出，污染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关乎正义与民主的问题。

尽管许多贫困人口正逐渐适应与污染共存的生活，但也有不少人针对污染问题正式提出投诉（2003年达42.6万起）⁷⁶；此类问题若长期悬而未决，往往会引发针对有关部门的“纠纷或事件”（2003年达6万起）⁷⁷。

污染现象在贫困地区和村庄更为频发，例如“癌症村”上坝村，该村每年死亡病例中有一半死于癌症⁷⁸。而在中国全国范围内，每五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癌症⁷⁹。

全国各地每天都在上演着触目惊心的污染惨剧：在农村，直到不久前，制造工厂还常在腐败地方官员的协助下征用耕地；在城市，2005年时已出现大规模人口内迁，给水资源和废弃物管理带来了巨大压力。⁸⁰

据估计，农村地区有3亿人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且农作物往往是用受污染的水灌溉种植的。⁸¹ 全国70%的河流受到污染，而在全球污染最严重的30个城市中，有20个位于中国。⁸²

“中国”的新衣

生态状况已极其严峻，绝非换上一身新装就能掩盖——哪怕那面料再鲜艳，上面印满了仿冒的商标或盗版卡通形象。2005年，这种新式装扮随处可见，成为自1979年以来中国最显眼的变化之一。用来装载商品的廉价塑料袋所留下的彩色塑料碎片，也同样无处不在。这些袋子最终被风吹水冲，四处散落，挂在树枝上，化作一个个零星的鲜艳斑点。在我初次访华时拍摄的照片（例如黄河沿岸的影像）中，还看不到这些塑料碎片的踪影。

然而近来，我却目睹了污染的迹象：长江两岸遭到了破坏，桂林与阳朔之间那段绝美的漓江水域也出现了污迹斑斑的景象。漓江堪称世界上最壮丽的峡谷河道之一，数以千计形态各异的石灰岩山峰（地质学上称为“喀斯特”地貌）从平原上拔地而起，其姿态令人联想到跳动的音符或大象的鼻子。

据宋朝学者范成大记载，他曾将桂林喀斯特地貌的画作寄给家乡的友人，但鲜有人相信画中景象为真。

如今，这种地貌已成为各类廉价工艺品（从竹筒卷轴到灯罩）上中国山水画的常见题材——画面通常描绘着一座草木葱茏、或许还点缀着一座宝塔的陡峭灰色山峰，背景中则隐现着更多连绵的山峦。

这片地貌长久以来一直是那些描绘竹林景致的画师们肆意临摹的对象，它毫无保留地向世人展示着那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约七万座宛如浑圆臀部般的奇峰。

尽管昔日风光已渐显褪色，且对于当地人而言，这种乡村生活所带来的慰藉也已不复往昔，但这趟在漓江上历时五小时、全长 85 公里的航程，依然是我近期旅行中的一大亮点。

钢铁游船穿行于喀斯特地貌构成的山谷之中；沿岸翠竹掩映，飞瀑从山间倾泻而下，而山峦则拔地而起，矗立在因船行激起层层涟漪的碧波之上。船尾飘来阵阵饭菜香气，伴随着扬声器里传出的乐声，那深邃的碧水与环抱的群山令我深受触动——它们共同营造出一种宁静而宏大的氛围。

中文里有一个词，拼写为“you”（旧拼法为“yeau”），其含义既指漫步闲逛，也包含游泳或随波逐流之意。⁸³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情境主义者”（Situationists）及其关于在巴黎街头“漂移”（drifting）的理念——尤其是在上下班高峰时段，身处熙熙攘攘的人潮之中时，这种联想便愈发强烈。

在这条宁静的河上，我不禁联想到“情境主义”式的画面：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离开了工厂与田野……我仿佛看见他们顺流而去，仰面漂浮，凝视着渐显晴朗的天空，乌黑的头发在碧绿的水中如纤细的鳗鱼般游动。

河流变幻，人世沉浮——若非“道”的说法过于繁杂，这流变本身便可恰如其分地被称为“道”。

如今，游船挤满了河面；而在过去，人们多是乘坐竹筏，利用渔网和鸬鹚捕鱼——那些受过训练的鸟儿颈上套着环，以防吞下捕获的鱼儿。

看着那一家人乘坐细窄的竹筏横渡河面，我心中不禁涌起一丝愧疚，觉得自己仿佛给他们带去了属于游客的污秽；孩子们跪在竹排上，紧挨着湍急的流水，用那双结实的小手紧紧抓牢竹竿。

反污染骚乱

新中国的生态困境影响着数以百万计民众的生活；这一毋庸置疑的事实，通过《南华早报》首次报道的一则事件得到了体现。⁸⁴ 2005年4月，浙江省华溪镇的村民要求搬迁工厂，并用石块和棍棒袭击政府工作人员，造成数十人重伤，同时损毁了警车和公交车。由于空气和水源受到有害物质污染，村民们每一次呼吸都能感受到污染的存在，无法种植安全可食用的农作物。

当地官员持有这些工厂的股份，因此几乎没有动力去叫停甚至减少废气与废水的排放。华西村的村民起初向省会及北京的官员反映情况，却无功而返。

作为最后的手段，一群以女性为主的老年人搭起帐篷，封锁了通往工厂的道路。她们的英勇行动迫使化工厂停产。警方曾借口要帮助在寒风中的老妇人而将村民包围，结果反被更多当地民众团团围住。

一位次日抵达现场的记者——她的笔记被警方当场没收——称自己看到一件警服披在一辆损毁严重的汽车上。据目击者所述，这场冲突导致了双方人员伤亡。

2005年8月，浙江省眉山镇爆发了一场类似的抗议污染事件；当地的天能电池厂持续向水源排放含有高浓度铅的有毒废弃物。

这些处置不当的废弃物给儿童造成了尤为惨痛的后果：即使那些未因铅中毒而丧生的孩子，也饱受严重生长发育障碍的折磨。

一千名警力进入该镇周边村庄，殴打那些要求关闭工厂的抗议者——正是这家工厂导致了他们孩子的健康受损，甚至夺去了部分孩子的生命。

当晚，五千名居民采取了报复行动，冲入政府办公楼和工厂厂区并纵火焚烧。事件平息前，共有四辆警车被烧毁，数十人受伤。

85

为了避免西方人在评判他人时忽略了自身的责任，必须指出：美国的电子垃圾常被运往中国进行回收处理，而从事这项工作的往往是儿童——他们在毫无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一边在有毒粉尘的包围中搜寻电脑零部件，一边吸入焊接产生的烟雾。⁸⁶

由于美国尚未批准《巴塞尔公约》，美国人出口废弃电子设备的行为是合法的；事实上，美国回收的电子垃圾中，有 50% 到 80% 都被出口到了海外。

尽管中国曾于 2000 年颁布禁令，禁止进口电子垃圾以遏制此类贸易，但如今在中国合法开展活动的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发现，电子垃圾依然源源不断地运抵广东省的贵屿——那里是中国此类废旧电子设备拆解处理的主要集散地。

随着越来越多的儿童因接触有毒物质而丧生——这些有毒物质是中国经济产能过剩及全球化经济体系的伴生物——民众的反应可能会像清水河畔桂登（Guideng）地区那些居住在冶炼厂附近的农民一样。

当时，烟囱排放的烟尘导致了严重的肺部充血及其他健康问题；因此，2005 年 4 月，600 名农民冲击并捣毁了这些冶炼厂，而厂主及其保安人员则躲在办公室里不敢露面。显然，党政官员担心这种环境状况会危及社会稳定。

同样是在 2005 年 4 月，邻近的下潮水（Xiachaoshui）村有 1000 名村民花了一整天时间，捣毁了数百个污染河流的矿场；事后，当地官员动用扶贫资金在几家餐馆安排了一顿迟来的午餐，试图以此安抚抗议民众。⁸⁷

- - - -

三、社会肌理的撕裂

关于中国现阶段一党专政统治的持续存在，必须反复强调一点：即使考虑到政治制度的不平衡发展，近乎绝对的一党制也代表了一种独裁统治。

20 世纪 20 年代兴起的共产主义思潮提出一种设想，用“理事会共产主义”替代了以政党为导向的制度，允许多种类型的理事会，通常是由小团体组成的，包括热爱自由的自由派社会主义者，组成一个更大的联盟。

1979 年，当我独自一人在济南火车站后面呆了一会儿时，一个说英语的年轻人直接向我表达了对自由的渴望。当时在外面，天色已晚，我的翻译大叔去找我们的车和司机。

那个年轻人走近我，但看向别处。“我们将继续。”

“继续什么？”

我们的目光相遇不到一秒钟。

“为自由而斗争”说完就走开了。

我惊讶地听到了英语，耳朵记录下了他说的话。然后看着他消失在人群中。

这时，我的翻译突然走到我旁边。“他说了什么？”

“没什么，”我说。

“别听他的。”

路人当然是对的，1989 年，人们在天安门广场集会，不断挑战审查制度和诚实表达的极限，为中国的自由和民主而战。

然而，2005 年，威权政府对信息的控制仍然令人遗憾。国营通讯社为党和军队信任的成员提供了一个特别版本的新闻，大概在呈现、范围和细节方面更准确地反映了现实。⁸⁸

企业所有的媒体开始与政府对信息的控制相抗衡，勇敢的记者在这个过程中经常危及他们的个人自由。在“莫须有”的情况下入狱的中国记者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⁸⁹

尽管党严格审查互联网，尽管有一项关于“正确引导舆论”的互联网相关的新法律 90，但党的领导人意识到，他们根本无法阻止信息泄露给所谓的“网民”。

到 2005 年，独立出版的书籍也将传播有关食物中毒和 SARS 的信息，SARS 是“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的缩写，是本文所述更广泛的新中国综合征的关键部分；以及其他重要事项的信息，如农民的困境。⁹¹

赤壁市羊楼洞古村落，一位年轻女子透过窗户凝视着一条朴素的人行道。最近的一个镇是赵李桥，这里的茶从唐代开始种植和加工，以松峰绿茶、羊楼洞砖茶和湖北老清红茶而闻名。

她曾深爱那个村庄——那里的小径蜿蜒跨越溪流，有些建筑可追溯至明清时期。如今，她风华正茂，却发现对过往已无牵挂，对未来亦无寄托。

始于“四个现代化”的经济改革，引发了从农村向飞速发展的沿海城市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无论是像窗边那位女子一样的单身女性，还是饥肠辘辘的单身男性，纷纷背井离乡，离开了农村。丈夫与妻子们正纷纷逃离曾经相遇相爱的广袤天地，奔向拥挤的城市。在那里，与外界的接触宛如第二层皮肤，现实无处不在地强加于人，让人无法逃避。

这些夫妇正离开他们一生都熟悉的土地，在城市里寻找工作，随着火车驶离车站进入透明的夜晚，他们与生养他们的故土失去了联系。

这群流动人口不再脚踏实地，且大多未能清醒地意识到：随着与土地的剥离与疏离，他们中的许多人将在混乱的时代浪潮中迷失自我。

因工作导致的长期分居使离婚率激增，虐待儿童也已成为普遍问题。据政府承认，自杀率高得惊人，高居世界之首。

这些，连同环境污染和阶级冲突，都是新体制推行过剩生产、恶性竞争和自我牺牲所带来的意料之外的后果。

然而，这群估计人数高达 1.4 亿甚至更多的“流动人口”，92 依然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梦想——即便在某些时候，他们赖以支撑希望的并非手中的薪资，而仅仅是心中的憧憬。

由于未在城市登记户籍，他们成了“非法居民”，即所谓的“流动人口”；这种身份使他们时刻面临着被捕的风险。因此，在逃离经济萧条的农村、踏上漫漫谋生之路的过程中，他们始终承受着持续的心理压力。

在湖北省省会武汉的火车站，我见到了那些可能是“流动人口”的人们：比如一些农民，他们身着自己最好的衣裳，在车站那宽敞高大的候车大厅里一排排静静地坐着，金色的阳光透过窗户倾洒在他们身上。

我从那个需要购票才能进入的空调区俯瞰下方——看着候车室商业区里的人群：他们正数着手中的人民币，在候车大厅四周灯火通明的售货亭间选购商品，试图在踏上漫长旅程前买点什么来平复紧张的心情。

这些旅客大多努力展现出一副富足的模样，其风格与我在七十年代所见如出一辙——白衬衫、深色长裤配皮鞋——尽管鞋裤上仍沾染着乡间的泥点。也有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身着新款时装，色彩鲜艳，以此彰显自己在“红色资本主义”经济浪潮中取得的成功。

到了 2005 年，这些旅客身上依然保留着某些关于劳动的儒家礼仪与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然而，相比于昔日的道德准则，如今左右他们行为的更多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所引发的焦虑，以及对经济成功的渴望。

出于必要，我冒险走进火车站的主候车室，穿过迷宫般拥挤的人群，经过大厅，那里有一个大型洗手池——许多人排队使用。我有些忐忑地走进男厕所，深知在美国或欧洲，在火车站上厕所总是有风险的。不过，看来我有些多虑了：左侧那排长长的尿池边人很少，角落处更是空无一人，而右侧墙上开着一扇窗户。

我刚进去，就有两个年轻的乡下人跟了进来——他们有说有笑，走到尿池边时还打量了我一番。我转过身，面向那扇位于胸部高度的大窗户——这种设计在西方恐怕会被视为不雅。窗户上甚至没有玻璃阻隔，我的目光与外面路过的一位女性撞在了一起；她意识到我在做什么后，神情若无其事地移开了视线，脚步也未曾停顿。

时代确实变了。1979年我造访济南时，曾对一位女服务员说我想吻她，当时她假装没听懂我的话。

来到2005年，在武汉，当那位女售货员正为我扣上夹克时，我提醒她小心些，或许该退后一点，但她纹丝未动——她的手在我的胸口停留了片刻，感受着我那剧烈的心跳；仅仅因为身边有一位女性而心跳如此剧烈，这种事并不常见。

我对自己说，如果我强行吻她，那将是一种帝国主义式的亲吻——尽管她看起来、甚至闻起来都像是为爱而生的。空气凝固了。她紧贴着我，近得仿佛能读懂我的心思，这让我额头上渗出了汗珠。

“你可以娶她，”向导在我耳边低语。

“真的吗？”我的视线游移不定，仿佛一阵轻微的眩晕袭来。

“到底该怎么做？”

“把你的名片给她。”

女售货员平静地微笑着，没有退开，这让我觉得她没听懂刚才的话。如果她真能读懂我的心思，她就会明白：避免被强迫去爱的确切方法，就是从抗拒爱。

我的左眼眨了一下。我们的心灵在进行着无声的交流，用一种模糊了确切含义的语言，甚至连我们自己也无法完全领会。她的右眉微微颤动。

我把名片给了她；后来，我收到她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有一束乌黑的秀发和一张她那绝美面容的黑白实拍照片。看着这些物件，我不由得浮想联翩：想象着她的秀发垂落在纤细的颈项和米色的肩头，想象着她正向我投来那充满欢迎意味的微笑。

我的信件不可避免地延误了，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想被婚姻的枷锁束缚；我真正渴望的，是与一位深知劳作之徒劳的女性——或者是一位能将“摒弃欲望”这一佛家理念运用于消费的佛教徒女性——结为亲密伴侣；她应足够睿智，能温和地提醒我：主动选择简朴生活是一种美德，而甘愿沦为奴仆则是一种恶习。

在当今中国，想要找到一位志在消除国内无谓劳作的女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我曾遇到过一位来自武汉的售货员，她似乎颇为契合这一理想——我们在互通邮件时，她给自己取的英文名就叫“Free”（自由）。

她总会问我何时归来，但过了一阵子我们便心照不宣：那份亲密不过是转瞬即逝，随之而来的却是难以逾越的遥远距离——她身在武汉，而我远在华盛顿，那里还有别的中国女性等着我去结识。曾有一位藏族女子，她那动人的身影曾在某个春天点亮了华盛顿的街头；尽管我年长她一倍，但每当我靠近时，她那年轻的躯体总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与她成熟心智不相符的羞涩与悸动。她当时有些茫然，便问我知不知道该做什么。当她像骑马一样跨坐在我大腿上，并用纤细的双臂环住我的脖子时，答案已不言自明。

尽管在 2005 年的那次旅途中，我竭力表现得像位恪守儒家道德的圣贤，却仍忍不住注视按摩店里的女性，并留意到中国某些地区性工作者数量之众。

在阳朔，这类从业者随处可见；我结识的一位年轻女子——她很可能属于“流动人口”——曾被同行导游恶毒地指称为妓女，想必是因为她当时正与我同行。她或许也曾动过从事性工作的念头，毕竟导游这份工作报酬微薄，不仅工时长，每天还得长途奔波。

不过，这位新朋友的境况比大多数人都好。她正在一所私立学校学习英语，该校聘请了许多来此漂流和攀岩的外国人，享受着这片绝美的山水。

- - - -

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这让我一度怀疑她是否与当地警方有某种关联，尽管她看起来更像是那种尚未被完全管控的少数人之一。在河畔，她引领我领略这片土地的迷人风光：对岸矗立着喀斯特峰林，放眼望去，群峰在平原上绵延不绝，直至天际。她会用那宛如鸟鸣般清脆却又令人难以听懂的语调为我歌唱——关于这一点，我在本文关于阳朔的结语部分有更详细的描述。

这些流动人口——比如那些在武汉火车站宽阔候车大厅里映出的剪影，在午后倾斜的强烈阳光下熙攘穿行的人们——往往会在漫漫长夜里乘火车南下，追逐着在城市里拥有属于自己财产的梦想。许多人最终在城市的贫民窟里过着孤寂的生活——这种心理上的痛苦，往往始于他们踏下火车的那一刻。由于无法享受针对城市居民的食品和住房补贴，他们的经济状况往往十分拮据；而若要履行承诺，向留守乡下的亲人寄钱，生活便愈发艰难。

有些人或许还有余力并怀有强烈的渴望去追求“性”方面的享受，但所有人无一例外都渴望并最终拥有了某些商品——尽管这种对物质的占有，往往只能部分地满足他们的欲望。

资本主义——即便是“红色”版本的资本主义——就像一台精妙的机器，它置换了消费者原本的内心，那颗本可与爱人同频共振的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与之截然不同的泵；这个泵的运作，不再是与爱人共鸣，而是与商品那充满魔力却又往往不为人知的力量所散发的振动频率保持同步。

这些“漂泊者”通常在餐馆、服装店、工厂或建筑工地从事非技术性劳动，以此换取生存所需的物资。恶劣的工作环境和因贫困导致的营养不良，使许多人饱受慢性病折磨；而除此之外，他们还日益深受消费主义这一“普遍性坏疽”的侵蚀。

当地人出于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容忍这些漂泊者的存在，却往往将他们视为罪犯加以防备；然而，若由公正的法官来评判，便会发现他们身上最突出的特质其实是坚韧——一种远超常人的顽强毅力。

漂泊者们往往带病坚持工作；一旦有人倒下离世，便会有五个人冒出来接替其位。驱使他们投身劳作的，既有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有各种幻想与欲望——而这些幻想与欲望，往往源于那些诱人商品的广告宣传。

客观而言，农村失业问题固然严峻，但与此同时，由于人口向沿海地区迁移，农村也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

在靠近羊楼洞古村的赵李桥镇，一位茶园主表示，由于大家都进城务工了，很难找到人手来采摘茶叶。我担心孩子们可能已经在从事这项工作，而劳动力短缺只会加剧他们的困境。

值得称道的是，胡主席自 2005 年起免除了中国 8 亿农民延续千年的农业税。⁹³

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尽管他们仍需履行 30 年土地使用合同的相关义务——而这些合同往往由那些热衷于征用土地的党员干部所掌控。

如果说那些涌入沿海城市的流动务工人员，常在雨雾与烟尘中低头注视廉价手表，仿佛生怕上班迟到；那么身处乡间的农民，则忧心忡忡地望着地平线上升起的烟柱，生怕又有一位同乡的生计就此终结，而其田地也随之付之一炬，成为下一个开发对象。

当开发商想要农村土地时，他们只是贿赂党的官员，而这些官员反过来会为自己出售土地提供减税。农民们站在庄稼地里，凝视着升上天空的炊烟，一片寂静，只有鸟儿的歌声打破了这片寂静。

党员们假装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他们对耕地流失做出了反应，规定禁止开发，除非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例如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在争吵声中，各方都只是一个声音，村民们似乎抓住了在所谓的“凳子会议”中争取自己权利的机会，这种会议类似于社区委员会会议，是政府农村民主运动的产物。⁹⁴

在以武力对抗的血肉之战中，开发商利用雇佣军强行进行党派导向的征地。最近的一段视频报道显示，全身黑衣的军队袭击了河北省圣友村，杀死了六人，并将其余人进行了镇压。⁹⁵

那些被党用理论掩盖的革命本能，常常在实践中被这些村民所揭示，他们的生活在社会斗争的背景下具有历史性。

然而，作为一个热爱中国女性，所有中国女性的人，很容易看出，这种制度性腐败、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体系给中国农村女性带来尤为沉重的打击。她们默默承受，最终诉诸于自杀这一孤独的反抗方式，这注定成为红色资本主义早期崛起的历史记录的一部分。为了应对这一显而易见的社会问题，当局推出了各类妇女项目以及“和谐家庭”运动。⁹⁶ 中国女性的自杀率是男性的三倍。⁹⁷

许多农村女性惨遭在沿海城市务工的丈夫抛弃；若手中尚有土地，她们便继续耕作，独自抚养子女，陪伴她们的唯有鸟儿。太多这样的农村女性渴望一场“无梦的睡眠”——换言之，她们渴望的是死亡。

许多年轻女性无所依傍，甚至连中国美丽的自然风光也不再令人留恋，于是她们吞下唾手可得的农药自杀，以此将双眼蒙蔽，从此眼不见心不烦。

当未来十年因土地荒漠化和水土流失而迫使她们去购买根本无力负担的进口粮食时，她们又该何去何从？

饥饿将迫使那些未曾自杀的女性出卖肉体——她们在醉意朦胧中，从破败酒吧的酒桌转入昏暗的后屋，为了钱财忍受着那无异于强奸的性事。

饥饿与性，甚至是残酷的性，成了许多农村女性生活中的主宰力量；因经济现代化进程，她们被迫背井离乡，去迎合大批男性的需求。一扇后屋的门虚掩着，露出一对赤身裸体的男女。我看见那年轻女子正与嫖客交谈，似乎在问：“你为什么要让我做这种事？”

- - - -

到 2005 年，大多数集体农庄已完成私有化，这意味着过去十年间，惊人的 4000 万农民因土地被征用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从而引发了向城市的大规模人口涌入。⁹⁸

广东沿海城市在庞大的外来务工人员重压下呻吟；这些人并非轻盈地“漂泊”，而是拖着沉重的脚步下班回家，在不确定性不断消散又重新凝结的过程中艰难前行。一名工人从商店橱窗里看到了自己的倒影，却无法确定自己与那个影像之间有何共通之处——那影像初看似乎迷失在货架的商品丛林中，但细看之下，却已深受消费主义那无孔不入的“坏疽”之害。

中国的城市应对流动人口所带来额外压力的方式就是不再把他们当作人来看待，无论是把打工者当作机器齿轮的工厂老板，还是向这些工人伸出黑手的犯罪分子。

在深圳，一个眼神凶狠的男人看着我装满相机的包，在人行道上的人群中打量着我，盘算着是否应该孤注一掷，作出无法无天的大案，比如暴力抢劫。

但他的机会渺茫，他必须意识到，因为我比他大得多，但他可能是世界各地城市的蓝领工人之一，他们有如此严重的生产安全问题，反正都是命悬一线地讨生活——他们冒着下巴骨折或入狱的风险也未见得糟糕。

即使他更有可能是一个流动人口，在某个时候，他也做过一些工厂工作，残酷的打工经历让人感觉像是被抢劫甚至强奸了。现在的他似乎想抢劫我或强奸我的导游。

其他人，大部分白领，行色匆匆奔走在街头。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他们不停地在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大楼之间奔波，“在太短的时间内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⁹⁹

当然，权力的运作大多不在街头，而是在封闭的房间里——这些房间往往由酒店提供给政党成员或军方高官等特定人士，这些人与酒店经理及安保团队关系密切。

会议结束后，空气中留下了狼群般令人胆寒的气息；此后，人们只能看到他们乘坐深色轿车疾驰而过时留下的阴影。

胡谈论着“长治久安”与应对重大问题的能力，同时却在全国各地的城市组建了专门的防暴队。100

他或许深居于防卫森严的专车与宫殿之中，甚至与席卷北京的沙尘暴隔绝开来，以至于无法有效应对因数百万人口涌入城市而产生的海量生活垃圾问题。

这些从农村迁徙而来的“鸟儿与草木般”的人们，被迫与家人分离，饱受孤独煎熬；他们在城市里拼命劳作，眼看着垃圾在身边堆积并当着他们的面腐烂。

街头腐烂的垃圾，映照出他们灵魂深处的溃烂——他们从事的工作，往往随着工时的增加，报酬反而不升反降。当工厂爆发骚乱，或是有人从大学宿舍楼纵身跃下时，他们并不觉得孤注一掷有什么可失去的。

考试成绩和职业机会的竞争是中国城市年轻人自杀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主要原因。许多人是在冒出这个念头后不到五分钟冲动行事的，这表明他们没有患抑郁症，而是因为物质条件和前景黯淡而自杀。

在中国，自杀是仅次于肺癌、交通事故和心脏病的常见死亡原因。然而，自杀是15至35岁人群的头号死因。101 世界上四分之一的自杀事件发生在中国，研究人员认为，每年25万起自杀事件的数字被严重低估了，因为许多死亡事件没有得到调查。

对于那些因腐败行径败露而自杀的党政官员，人们鲜少同情。这些官员的腐败手段包括：收受回扣以纵容污染，以及侵吞公款用于如今已被明令禁止的澳门豪赌之旅。

在此类境况下，自杀显然成了一种“可行”的选择，毕竟腐败本身就可能招致死刑。过去，死刑通常通过向头部开枪执行枪决，但如今法院正逐渐转向使用配备了致命注射装置的移动执行车。尽管环境恶化，中国人在黄昏时分仍享有迷人的景致；随着阶级分歧的日益加深，中国公民利用这段时间思考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

夜幕降临时，他们漫步于湖畔河边或城墙之下，随后输入密码进入私人公寓的门厅，或是握住那扇总是敞开的宿舍大门把手——无论身处哪个阶层，人们都渴望哪怕只是暂时地从“劳动者”转变为“休憩者”。

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愿景，同时也着手遏制全国各地频发的阶级冲突——例如，一辆手推车刮蹭豪车竟引发了全面骚乱，102 又或是全国范围内数量惊人的有组织抗议活动。

在邓小平的增长公式中——即依靠国内储蓄、外商投资和廉价劳动力，理论上足以让国家摆脱任何困境，却并未将尖锐的阶级分化与生态灾难纳入考量。

市场资本主义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土壤中蓬勃发展，造就了许多成功案例；有人曾向我形容这些案例为“小花”——意指自世纪之交以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中小企业。

透过那些似乎比花朵更为茂盛的杂草望去，人们依然能看到国有企业吸纳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这一新体制在极短时间内将“劳动”与“消费”之间的对立推向了极致——这两种力量看似起源各异，实则在劳动力市场上将自身作为商品出售以换取消费市场上的商品这一过程中，发生了相互作用。

显而易见，无论是在抽象层面，如每日工时统计数据；还是具体层面，如以自杀率衡量的异化现象，中国工人都已为“红色资本”牺牲了自己。

当前的领导层利用劳动力市场，该市场始终与庞大的监狱劳工体系处于竞争关系，以及各类商品——其中既有实用之物，也有许多仅具象征意义或交换价值的物品——以此作为两大杠杆，来维护党对行政权力的垄断。

《时代》周刊曾在封面上将胡锦涛主席的“新装”描绘成一件印有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设计师首字母缩写的中山装——这并非暗示胡本人沦为了消费主义的牺牲品，而是表明他深知工业制成品，尤其是奢侈品牌所蕴含的魔力。¹⁰³ 他一方面任由这些事

物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又试图驾驭这种力量为己所用，以此转移民众对自己困境的关注。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日常生活是如此艰难，他们陷入了工作和购物的循环中，他们发现除了为社会消费做贡献，无法再履行传统的社会义务。

他们受限于时间，且作为消费者所体验到的那种相对新鲜的“自我放纵”快感，似乎比探亲访友更具吸引力。¹⁰⁴

这些诱人的商品往往有着足够的魔力，让大多数劳动者甘愿重返工作的“牢笼”去度过新的一天，而不是选择暴动或跳楼轻生。尽管如此，社会结构已然撕裂并逐渐解体。时间终将证明，这个拥抱了某种极具破坏性变革形式的市场，能否在不可避免的危机中幸存下来。

过去二十六年间，中国的变化翻天覆地，如今这个“中央之国”正对世界施加着巨大的、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影响。这不禁让人发问：面对中国可能出现的危机，世界能否安然度过？

正因如此，我们更应警惕中国自然资本被肆意掠夺与开发的事态，并意识到——无论在环境还是社会层面——人们的处境实际上都比1979年时更为糟糕。人们或许自以为获得了更多自由，实则不然；或许自以为生活质量有所提升，事实却并非如此。

胡锦涛至少在倡导“和谐”——尽管这一目标显然符合其自身利益；而且，中国尚未像西方那样，出于某种阴暗的策略考量，将“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作为一种制造紧张局势的手段，以此诱发民众的焦虑感并促使其渴望获得国家保护。

中国民众或许能在胡锦涛“社会和谐”政策的相关规划中找到自由与安宁，但更有可能的是，该政策将引发一连串连锁变革；而在许多人真正实现自由与安逸生活的愿景之前，这些变革便已接踵而至。

革命往往发生在经济增长与期望值攀升的时期；中国人民拥有可资借鉴的革命与起义历史，若时机有利，这些经验或许能助其实现一场“大休止”（Big Rest）。

无论是农村地区抗议污染的民众，还是城市中漂泊无业的群体，都深知商品经济犹如寄生虫，正威胁着要扼杀其赖以生存的宿主——即工人和消费者。即便污染未能直接夺去他们的性命，长期的劳作与消费主义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将他们彻底摧毁。

抗议并非在中国各地都行得通；若采取“天安门式”的占领行动，占领者将极易遭受高科技武器的打击——而这类武器在1989年时尚不具备。

自主个体间的感官交流与随之而来的深度休憩，乃至必要时采取的破坏工作设施的行动，都是应对“新中国综合症”的最佳即时疗法；而要彻底治愈这一病症，唯有通过一场真正能带来持久解脱——使人们摆脱过度劳作与失控消费主义——的大规模罢工。

尾声：关于赤壁、武汉与阳朔的评述

赤壁市

2005年，我踏上了一段漫长的旅程，穿过盛开着黄色花朵的油菜花田，抵达了长江边的一处所在——这里正是公元208至209年冬季“赤壁之战”的发生地。

后来，在唐宋年间的某个时期，人们在岩壁上刻下了这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水战的名字，以此标记出这个为大多数饱学之士所熟知的地点。如今，这场战役也为“拒绝工作运动”（refusal of work movement）提供了关于战略博弈的启示。

在战事展开之际，北方的军阀曹操意欲夺取长江以南的领土，以期重新统一东汉王朝。曹操在这一临江峭壁处与南方的两位军阀——孙权和刘备——展开了对峙；后者施展了一系列精妙绝伦的计谋，令北方军队陷入了极度被动的境地。

其中最精彩的计谋涉及南方联军（其兵力少于北方）派遣一名间谍潜入北方营地。为了让这名间谍看起来像个真正的投诚者，南方先对他施以鞭刑，使他身上留下了足以取信于人的伤痕。这名间谍成功说服了北方军阀将战船首尾相连、横列于江面之上，理由是这样既能增强庞大船队的稳定性，又能缓解士兵们的晕船之苦。

随后，南方军队向曹操递交了一封来自其他“有意投诚者”的降书，声称这些人将倒戈并带船投奔，但实际上，这些船只已被改造成了“火船”——即浸透了鱼油并装满干燥芦苇，极易燃烧。当夜风转向有利方向时，南方军队驾船逼近北方连环船阵，点燃了自家的船只，随即乘小船悄然撤离。

这些燃烧的船只顺流漂向北方庞大的船阵，一艘接一艘地撞击着敌方的木质战船，引发了连锁燃烧。与此同时，南方军队从轻便小船上射出的火箭，更进一步加剧了北方舰队的熊熊火势。北方

军队征战已久，且不擅水战；面对这片因战船焚烧而崖壁尽赤的长江水域，他们或仓皇逃窜，或被驱逐溃败。

“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这便是后世对这场战役经久不衰的评价。105

联军的胜利使刘备与孙权得以掌控长江天险，以此为防线，最终促成了南方两大政权的建立。

那么，那些抵制工作的人能否构想出类似南方联军那样的策略——一种宛如武术招式般的手段，将当下投入工作的全部力量反转过来，从而瞬间扭转支持工作与反对工作两股力量的强弱态势？

武汉

武汉的黄鹤楼始建于公元 223 年，经过多次重建，最近一次是在 1981 年。如今，每当我身处他乡，总会因各种缘由想起这座楼阁。当我们沿着红木台阶盘旋而上，登上这座矗立于蛇山之巔的建筑时，向导向我讲述了关于它的故事。

“一家酒馆的老板会免费给每一位画黄鹤的艺术家提供葡萄酒。”她停顿了一下。“黄鹤会活过来，为顾客跳舞，这对生意有好处。”

我望向远方朦胧的云雾。“非常有想象力。”

“唐朝诗人崔颢曾写道，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我们继续拾级而上，欣赏着塔身层叠的屋脊和交错的飞檐。

“这里向来是文人墨客的聚会之所，”她说，“如今楼上还专门为造访的诗人留出了一处空间——待会儿你会看到的——那里摆放着桌椅。”

我脑海中浮现出他们的身影：那些敢于对艺术付之一笑的文人，在此静候明月映入江心，好借鱼儿之口吟咏诗篇。

“李白——或者按你们的说法叫 Li Po——曾写到过此地，”向导继续说道，“当时他浪迹天涯，思念故土，怀念着遥远的长安。”

“他写了些什么？”

.....

“他写道自己身处‘黄鹤楼深处’，就像现在这样。”她指着那些有着朱红立柱、木质光洁的房间，“他听见竹笛吹奏《梅花落》，便感叹道：这是江畔城池暮春时节的景致。”106

“他表现得相当克制。”我环顾四周，看着墙上的挂毯和窗棂上精细的纹理——当然，这一切与八世纪他身处此地时相比早已物是人非。“遗憾的是，我可没有这份克制。”

我甚至会毫不克制地说，我个人的“智识赤道”并不在某座高塔之上，而是在那米色大腿构成的双柱之间；我必须明确表示，我对中国女性怀有极高的敬意，而那双腿交汇处的酒红与玫瑰色地带，对我而言，正是道家所推崇的那个真正的“道”。

站在露台上，我望见长江在眼前蜿蜒流淌，一道低矮的桥梁横跨其间，将江水一分为二；从这座矗立山巅的五层楼阁之上，透过朦胧的烟霭，我能看见太阳留下的火红余晖。

“关于这个地方，李白还写过什么吗？”

“没写多少，”她说，“传说他没有继续为黄鹤楼写诗，另有一番用意——他选择了延宕。”

“延宕？他是为了迁就自己那出了名的嗜酒吗？”

“据说他采取了一种策略性的延宕，让位于崔颢的诗；从他的诗作中可以推断，他很懒，而且——没错——还有酒要喝。”

当我离开楼阁景区时，脑海中浮现出从高处俯瞰这片广袤大地时所联想到的历代诗人；此时，我目光所及是毛泽东早年书法的精美复刻，那笔触间流露出勃勃生机与宏大志向。在他的书法世界里，他仿佛一位属于草木鸟兽的诗人，将自然意象融入革命的宏大叙事之中：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谈及这座楼阁，毛泽东重申了那句脍炙人口的诗句——黄鹤一去不复返，并添上了“白云千载空悠悠”的意境。许多人梦想

着“一去不复返”的其实是那异化的劳动，并将这些悠然飘荡的白云视为自然界中“懒散”的绝佳写照。

当毛泽东看到楼阁礼品店里兜售的“文革”遗物——那些六十年代的徽章、海报以及收录其军事思想的书籍——时，或许他自己也会渴望一场彻底的“大休息”吧。

如今已是 2005 年。那些过度劳作的人，在漫长的一天里砸过工厂、毁过矿山之后，或许也会像毛泽东此刻可能想到的那样：在继续从事更多正在扼杀地球的异化工业生产之前，何不暂缓下来，尊重已经完成的工作，暂缓于已经存在的一切异化工业生产？

诚然，面对那些客观上极其强大的力量，“延宕”是一种软弱而主观的回应。然而，在新中国，劳工组织者所处的环境如此危险，人们几乎只能设法避免过度劳动和污染，并从艺术、体育和科学中寻求慰藉。

在整个中国，想必有许多懒散的诗人怀着巧妙的策略，设法击败红色资本及其众多强有力的支持者——至少在个人层面，或者暂时如此。

李白的“延宕”提供了一个范例，它介于革命策略与反抗的诗意姿态之间。中国人应当记住这一点。我敲响了塔前那口巨大的好运钟，祈愿这种策略能够推行至全国，甚至全世界。

阳朔

“单枪匹马”的革命或许难以实现，但“独辟蹊径”的解决方案却未必不可行。漓江游船行程结束靠岸后，我穿过一排排商贩摊位，步入那座尘土飞扬的小镇——我只是众多游客中的一员，在那些身穿亮黄色上衣、头戴同色帽子、从学校涌上街头的孩子们中间穿行。

这是一个坐落在群山环抱的小平原上的田园胜地，给人一种这里的人们已在此繁衍生息数千年的感觉。2005 年的阳朔也是一座蓬勃发展的城镇，许多商户生意兴隆；街上挤满了自行车、摩托车、

轿车、卡车和巴士，嘈杂的广播声（内容令人难以听懂）在空气中回荡。

更多的孩子——成百上千个——涌入了我们周围及更远处的十字路口；他们让我想起了田野里那些黄色的花朵——尽管某些特定地区遭受了环境灾害，但这些花儿在许多地方依然生长得郁郁葱葱、生机勃勃。

我又走了半公里到达了酒店，这是一家四星级酒店，大堂里挂着总统和总理的照片，尽管比尔·克林顿总统等游客在1998年访问时并没有在这里过夜，而是回到了大城市桂林，那里距离桂林只有几个小时的车程。我的计划是留下来，所以我登记并把行李放在房间里然后再出去。

黄色瓷砖上的黑色钻石标示着穿过大厅的路径——肉桂色的墙壁带有金色的波浪，顶部饰有白色的花朵，看起来像是在墙上的涂鸦；白色的天花板上画着同心的金色圆圈，给这个地方带来一种迷人的感觉。

穿着制服的接待员全神贯注于其他客人，所以我沿着大厅穿过一套应该是妓院的房间——第一间屋子里有一个漂亮的女人穿着内衣看电视；女性性工作者在第二间房里打牌喝酒。第三个房间的百叶窗是关闭的。

一种偷窥欲的快感涌上心头，我看了一会儿前两个房间里的奇怪场景，想象着第三个房间里正在发生什么，因为人影在百叶窗后面移动。根据我对世界的了解，我认为这并不奇怪，在这种情况下，这更多地与恐惧而不是爱相关。

女人们在房间里悄无声息地走动，我感到她们的生活与我的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格格不入的错位感。如果她们不是衣着如此暴露、显然是在等待提供性服务，这一幕本不会显得有什么特别。也许只要我愿意等待，只要我有足够的耐心，这些中国女人就会向我流露出我所感受到的那种温柔——也许她们会为我宽衣解带，而她们身上那种异样的特质也会随之变得美丽动人。

不，她们心不在焉，对我视而不见，于是我转过街角，走向那个服务于整个按摩区的小售货亭。一位男经理从帘子后面走出来，将他那圆滚滚的肚子抵在柜台上。

“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你们这里有桑拿吗？”

“有的。”他挥了挥手，“跟我来。”

经理示意我穿过那道敞开的帘子——桑拿房就在那里，但我却忍不住透过玻璃门，注视着那个身穿内衣、独自等待下一位客人的妓女。

“谢谢。”我对经理说道，“也许我待会儿再蒸桑拿吧。”

我对那个坐在玻璃隔间里看电视的女人的爱意迅速消退，宛如幽灵般转瞬即逝，因为这整个场景透着一股令人作呕的商业气息。我穿过大堂走廊，正要走向楼梯时，一位二十出头、身材娇小的中国年轻女子试着用英语跟我搭话。她的话我几乎一句也听不懂。

“你很努力在学英语，是吗？”

“是的，”她说。

“要不跟我练练？”

她笑了笑：“好啊，我想练。”

我们在酒店楼梯上的这次偶遇发生得太快，我不由得怀疑她是不是警方安插的眼线，或者是从事性交易的女子。不过，她那身白裤配同色棉质上衣的打扮，让她看起来既清爽又体面。

“我刚申请来这家酒店工作，”她说，“目前我在做导游。”

“你知道那个形状像月亮的岩石吗？”

“我们经常带游客坐竹筏去那里。”

“是在漓江上吗？”

“不是，那条河叫‘遇龙河’。明天我可以带你去。”

我们沿着楼梯往下走了几级。

“你一定要去山水剧院，”她说。“它建在河上的岩溶周围。”

我看过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视频，视频中红色的渔网随着旋律飘扬，舞者服装上的水钻光芒闪烁在水面上。

- - - -

“好吧。我们就看那个和其它你推荐的地方。”

我们走出酒店，沿着最后一截台阶拾级而下，步入街头。

她轻声哼唱了几句。“请原谅，但我自己也想投身歌剧——这正是我住在这个村子里的真正原因。”

我向她点头致意，想象着她成为“漓江女儿”的一员——那些唱着“藤缠树”并吟咏爱情典故的姑娘们。我们沿着主街漫步时，她又为我哼唱了几句——那是一位南方女子在吟唱“每当有人经过”时的情景，正如诗人李白笔下的意境。107

一个不留神的路人撞到了她，她那小巧的双唇随即紧闭。她身形娇小，看起来有些柔弱，我不由自主地想伸手揽住她。当我的手触碰到她的背部时，她猛地转过头来。

“对不起。”我微笑着安抚她，“我不是有意惊吓你，只是想找刚才去酒店路上看到的那家卖反转片胶卷的店。”

她点了点头，我独自走进店里，想仔细看看那些胶卷——我打算稍后买下它们。

“你的声音很动听，”她说，街上似乎很平静。““那是一种用来向冷漠的人和糟糕的事物传达快乐的声音”

“你应该知道，我写的东西并不美好，比如战争。”

“我以前在书店工作过，”她说。“如今，比起单纯靠大脑阅读，我更喜欢那种充满温情的口头表达和肢体语言。”

“我同意。”

“你大概想得太多了——我不喜欢那样。”

我唤了她的名字。

她笑了。“我喜欢你的语调。”

我长长地吹了一声口哨。“你说得对——我确实心事重重。”

1979年1月，也就是我第一次访华的前六个月，华盛顿与北京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实际上终止了美国与台湾之间的防卫条约。许多国际关系学者当时并不确定，面对这座距离大陆仅180公里的岛屿，美军是否总能克服中国所拥有的战略优势。

- - - -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中国一向自称是和平力量，但你们或许还有其他或多或少带有隐蔽性的战略意图。”

我试着平复思绪，提醒自己：1979年初爆发的中越战争并未产生多大实质性后果。而如今，到了2005年3月，北京已出台新法，将实现与台湾的统一确立为目标，并保留了使用武力的权利。

我瞥了她一眼。“我担心西藏发生过的事会在台湾重演。”

脑海中闪过一条近期的新闻标题：俄罗斯向中国提供可用于攻台的两栖攻击舰。

“我们不需要通过内战，”她说，“就能实现与台湾的统一。”

“你长着一张善于倾听的脸。”

“我是用心在倾听。”我指了指自己的脑袋，“不仅仅是用耳朵。”

铺设路面的街道延伸至河边一片夯实的泥土地上。这一次，我没有提出那种让女性难以接受的冒失建议——尽管她那高不可攀的气质下似乎掩藏着某种难以满足的渴望。我们小心翼翼地踩过一片湿润的泥地，眼前是碧玉般流淌的河水。

“你知道，你们的社会正在发生变化，”我回头看了一眼，朝镇子的方向比划了一下，“数以亿计的中国公民所做的一切，如今都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幸福。”

她抬头看着我：“一直以来都是如此……但我们并未忘记，每个人同时也应为大众的幸福而努力。”

我们继续前行，在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下——即幸福是共同的目标——踏上了水边那条延伸数百米、掩映在绿树浓荫下的混凝土堤岸。我们停下脚步，当她放声歌唱、而我用广角镜头捕捉河面细碎的波纹时，我们的灵魂仿佛交融在了一起。

我的镜头同时也捕捉着对岸的水牛、近处穿梭的船只以及天际线处形态各异的喀斯特山峰。我渴望定格的，既是那条大河雄浑流淌的姿态，也是她全情投入歌唱时那微微扑闪的睫毛——哪怕这歌唱仅仅是为了部分实现她的艺术梦想。

我将镜头转向她；她停止了歌唱。

— — —

“你愿意为我拍裸照吗？我会采用一种‘天真写实主义’的风格来处理这个场景。”

她摇了摇头：“我并不天真。”

鉴于她当初主动接近我的方式，我猜她对未知事物充满好奇；她珍爱自己，并以一种她与外国人交往时特有的爱意表达方式面对着我。

“有些东西我想给你看。”

她走近了一些，似乎是想看我的相机。“什么？”

“我不能说。”

她热爱新鲜事物——这一点，从她再次开口歌唱时的语调中，我便能听得出来。

我想告诉她，她就像芭芭拉（Barbara）——那位嗓音甜美如鸟鸣的法国女歌手，她的歌声常让人联想到拉丁诗人提图斯·卢克莱修·卡鲁斯（Titus Lucretius Carus）笔下那充满生机与繁衍之力的自然。她或许听不懂这个关于自然丰饶意象的典故，况且我也不愿打断她，因为我正沉醉于她的旋律之中。我的思绪涌动，感到一种轻盈，那轻盈感宛如她的大腿般曼妙。那一刻，我们仿佛脱离了大地，融入了河流，甚至融入了空气。

她再次停下了歌唱。“你结婚了吗？”

“我与现实的变迁结了婚。”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现在或许喜欢我，但七年之后，你未必还会喜欢我。”

她似乎陷入了沉思，琢磨着“喜欢”这种情感如何发生变化——正如她过往经历的那样，在不同的男人之间流转更迭。

像许多其他中国人一样，她也经历了经济开放带来的转变，从自我克制变得放纵。也许，在某个瞬间疯狂地去爱，随后又渴望别的东西，这本就是人之常情。我们沿着河堤前行，路过一对在柳树下接吻的情侣，她依然哼唱着歌。

我回头看了一眼。“那对情侣还在接吻。”

“他们一定很幸福，”她说。

“理应如此——毕竟他们是在彼此交融，而不是在消费商品。”

我们再次停下脚步，我架好三脚架，将镜头对准河对岸那片没有阳光、喀斯特地貌特征显著的风景。她轻抚我的头发；在我脑海的速写本上，她的身影与唐代道家房中术典籍里的女性形象重叠在了一起。108 我继续调整焦距，试图捕捉并延展这一刻——脑海中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段胶片透过极细微的光孔进行曝光，历经的不是几秒或几小时，而是数年时光。

“我不会拍照，”她说。

“我也不会唱歌，所以咱们扯平了。”我温和地笑了笑，“过来，我教你。”

她紧挨着我站定。我们双手一同握住快门线，随后她独自操作。随着她的触碰，快门落下；我们静静地坐在河边，纹丝不动，聆听着流水的乐章，以一种“无为”的姿态拥抱生活。

道家关于“无为”的理念——这一曾贯穿早期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如今在中国依然发挥着某种隐秘而深远的影响。

Len Bracken——香港、桂林、华盛顿特区——2005 年 4 月至 11 月

— — — —

1979—2005年大事记

引言

正如我在《新中国综合症》中所述，邓小平于1978年掌权，其目标是推行“四个现代化”。中国历史上的邓小平时代从这一年延续至1997年2月他去世。

1978年3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部宪法。宪法写入“四个现代化”，也写入“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1978年末，异议人士利用大字报开展活动。邓最初支持人们在北京长安街的一面墙上张贴大字报，后来却把张贴者称为“闹事者”。

“民主墙”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农村的人返回城市同时发生。他们声称自己曾受到不公正迫害，一些党内官员认为这种局面可能引发严重动荡。

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在墙上张贴《第五个现代化》，主张民主以及劳动群众掌握权力。如下文所述，民主墙运动延续至1979年。

整个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尽管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和总理等重要职务由其他人担任，邓仍被视为非正式意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他最后担任的正式职务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邓之后先后由江泽民、胡锦涛接替；两人也被视为最高领导人，尽管其权力不及邓。江泽民从1989年至2002年领导中国；胡锦涛则从2002年至2012年领导中国。

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时代，可从1997年7月英国将香港移交中国算起。

邓小平时代

1979年

1月：民主墙运动正在进行之际，邓小平访问美国；《中美建交公报》正式生效。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并终止参与与台湾签订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3月：中越边境爆发战争。越南此前入侵并占领柬埔寨，推翻得到邓支持的红色高棉政权；越南占领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也是争议之一。

越南是苏联盟友。中国宣称通往河内的大门已经打开，既定目标已经达到，随后撤军。

3月：魏京生要求邓支持真正的民主，并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是掩盖暴政的口号。魏被捕。

3月：邓提出不容争论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毛泽东思想。北京市政府同时颁布限制群众示威的新规定。

7月：为吸引外资，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四个“特区”，后来称为“经济特区”。

8月：赵紫阳进入中央政治局。

10月：魏京生因“反革命煽动”和间谍罪被判处15年监禁；间谍罪指控与他向外国记者提供中国对越作战的信息有关。年底，民主墙被迁到两英里之外，运动实际上就此结束。政治压制与经济改革并行的治理方式，在邓时代早期已经确立。

1980年

2月：邓支持改革派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四大自由”被取消。赵紫阳进入政治局常委会。胡与赵后来成为接替邓的两个竞争者。

6月：中国进攻越南高平省。

9月：赵紫阳因推动经济改革而出任国务院总理。

9月：1978年首次宣布的独生子女政策开始实施。除若干例外，中国夫妇生育第一个孩子之后再生育将被罚款。

1981年

党内保守派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针对不拥护“四项基本原则”的作家。运动意在遏制改革派，但包括邓小平、胡耀邦在内的主要改革倡导者也批评了一些作家。

1982年

12月：新宪法生效，规定言论、出版等权利，同时以遵守法律、劳动纪律和公共秩序等条款，使1978年宪法中的“四大自由”失去合法地位。

1983年

中共开展“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邓批评以低俗写作牟利的作家和艺术家；运动针对色情、西方影响下的服饰和发型以及宗教。邓等人后来叫停运动，认为它会威胁外国对华投资。胡耀邦和另一位改革派赵紫阳开始穿西式西装，而不是毛式中山装。

1984年

4月：中越边境再次发生战斗。

12月：中国与英国发表《中英联合声明》，确定香港按照“一国两制”模式移交中国，保留香港原有的市场经济等制度。中方由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代表，英方由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代表。

1985年

中国与苏联关系趋于和解。

1986年

12月：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发表言论，称社会主义运动失败，主张中国应按照西方模式发展，由此引发学生抗议。

1987年

1月：主张对学生采取缓和态度的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随后退居幕后。

方励之等知识分子在席卷全国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开除党籍。

11月：赵紫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李鹏任代总理。赵属于改革派，李则是反对重大改革的保守派。

11月：《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开始实施，经济决策权从党向政府转移。

1988年

3月：中国与越南为争夺南海南沙群岛九章群礁中的赤瓜礁发生海上冲突。短暂海战后，中国控制该礁。

4月：李鹏正式当选国务院总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引发对改革速度的争论。赵紫阳和邓曾主张放开价格，但邓后来放弃这一立场。

8月：失业蔓延并出现抢购潮，政府开始重新管制价格。

1989年

1月：方励之致公开信给邓小平，要求释放政治犯，尤其是民主墙活动人士魏京生。其他知识分子随后联署或发信声援。

4月：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逝世，享年73岁。学生游行前往天安门广场和中共中央所在地新华门，要求民主改革和新闻自由。警方行动促使更多学生及部分工人加入，抗议随后蔓延至其他城市。

赵紫阳主张温和处理，并支持学生提出的制止党内腐败的要求；邓则支持对示威者采取强硬立场。

5月：赵紫阳要求学生停止绝食。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戒严。

6月：人民解放军部队杀死大量被称为“反革命”的抗议者，这一事件常被称为“屠杀”。暴力不仅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也发生在北京其他地区以及许多其他城市。

6月：赵紫阳被撤销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江泽民接任总书记，并在仍然是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支持下成为其指定接班人。赵此后长期遭软禁，居住在胡耀邦曾住过的同一所房子里。

11月：邓辞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1990年

1月：为期两年的经济恢复计划启动。

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通过。

11月：上海证券交易所重新开业。

1991年

1月：1989年参加民主运动的示威者受审。

5月：新闻工作者被要求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同时向党内部下发秘密指示，警告防范政府被推翻。

1992年

1月：邓再次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呼吁进一步改革。

4月：三峡工程获批。世界最大的麦当劳餐厅在北京开业。

6月：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开始裁员。

8月：产业工人罢工。

1993年

3月：江泽民出任国家主席，同时兼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这是毛泽东之后首次由一人同时担任这三个职务。不过，邓在去世前仍保持对军方的重要影响，并继续被视为国家最高领导人。

4月：世界银行将中国列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6月：四川发生农民骚乱。

8月：美国认定中国企业向巴基斯坦出口美国导弹技术，随后对中美两国实施制裁。

1994年

5月：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这是中国后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一步。

1996年

3月：台湾举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

1997年

2月：邓小平逝世，享年92岁。

中国成为全球性大国

1997年

7月：香港由英国移交中国。

公安部采取措施控制中国互联网；美国开始使用“防火长城”一词形容中国的互联网审查体系。

10月：江泽民访问美国。

1998年

6月至9月：长江等河流发生严重洪灾，人民解放军参与抢险救灾。

11月：中日首脑会晤在日本举行。

1999年

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华盛顿称这是一次“误炸”。

7月：中国政府宣布法轮功组织为非法组织。

12月：澳门由葡萄牙移交中国。

2000年

11月：中美达成协议，允许中国发射美国卫星。

2001年

4月：一架美国侦察机被中国战斗机拦截。两机相撞后，美机被迫在海南岛紧急降落。

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2年

11月：胡锦涛接替江泽民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采取更强调民生的治理方式，提出通过扩大民主、加强法治、提高生活水平、缩小经济不平等、改善教育和加强环境保护来建设“和谐社会”。

11月：广东省开始出现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疫情。

2003年

3月：胡锦涛接替江泽民出任国家主席。

6月：长江三峡水库开始第一阶段蓄水。

10月：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

2004年

9月：江泽民辞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11月：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签署货物贸易协议。

2005年

1月：赵紫阳逝世，享年85岁。政府宣布进入“极度敏感时期”，警方特别戒备，以防出现类似1989年胡耀邦去世后发生的大规模示威。天安门广场及赵紫阳住所附近加强警戒；中国国内对其去世的报道极少。

3月：《反分裂国家法》通过。中国重申以和平方式实现与台湾统一的目标，同时声称保留为实现这一目标使用武力的权利。

4月：全国多地发生大规模反日示威，导火索是日本政府批准一本被指淡化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行为的历史教科书。

8月：中国与俄罗斯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11月：吉林市一家化工厂发生连环爆炸，造成6人死亡，数万人被迫疏散。

本大事记参考了多种资料，包括维基百科、法国《快报》网站，以及埃德温·白华·梁主编的《现代中国政治领袖：人物辞典》（韦斯特波特，2002年）和R. Keith Schoppa所著《革命及其过去：现代中国历史中的身份与变迁》（纽约，2002年）等书籍。

图片集

一九七九

共收录英文第二版中的 122 幅作者摄影作品

1979



济南，一九七九



北京，一九七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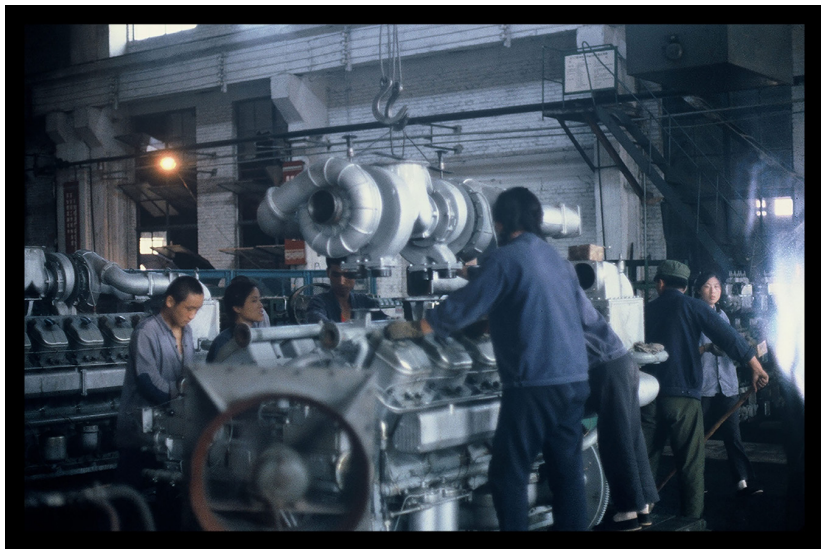
民主牆，北京，一九七九



北京，一九七九



香港，一九七九



济南，一九七九



泰山，一九七九



北京，一九七九



北京，一九七九



北京，一九七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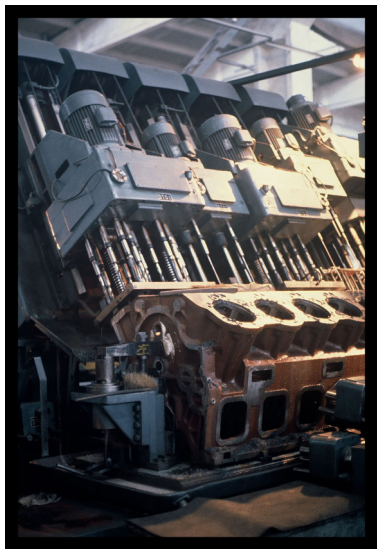
北京，一九七九



泰山，一九七九



北京，一九七九



济南，一九七九



山东，一九七九



北京，一九七九



北京，一九七九



北京，一九七九



北京，一九七九



济南，一九七九



济南，一九七九



济南，一九七九



济南，一九七九



山东，一九七九



泰安，一九七九



北京，一九七九



济南，一九七九



泰山，一九七九



泰山，一九七九



济南，一九七九



北京，一九七九



北京，一九七九



济南，一九七九



济南，一九七九



北京，一九七九



北京，一九七九



泰安，一九七九



北京，一九七九



泰山，一九七九



北京，一九七九



济南，一九七九



泰山，一九七九



泰山，一九七九



济南，一九七九



北京，一九七九



山东，一九七九



济南，一九七九



济南，一九七九

1995



香港，一九九五



香港，一九九五

2005



赤壁，二〇〇五



桂林，二〇〇五



香港，二〇〇五



漓江，二〇〇五



赤壁，二〇〇五



赤壁，二〇〇五



阳朔，二〇〇五



阳朔，二〇〇五



赤壁，二〇〇五



阳朔，二〇〇五



漓江，二〇〇五



赵李桥，二〇〇五



阳朔，二〇〇五



漓江，二〇〇五



阳朔，二〇〇五



漓江，二〇〇五



羊楼洞，二〇〇五



漓江，二〇〇五



阳朔，二〇〇五



赤壁，二〇〇五



漓江，二〇〇五



武汉，二〇〇五



漓江，二〇〇五



深圳，二〇〇五



武汉，二〇〇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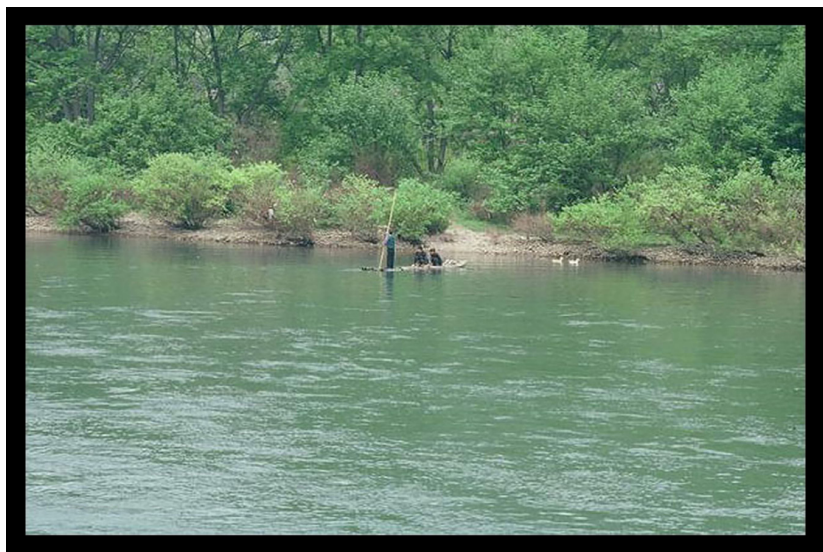
澳门，二〇〇五



赤壁，二〇〇五



羊楼洞，二〇〇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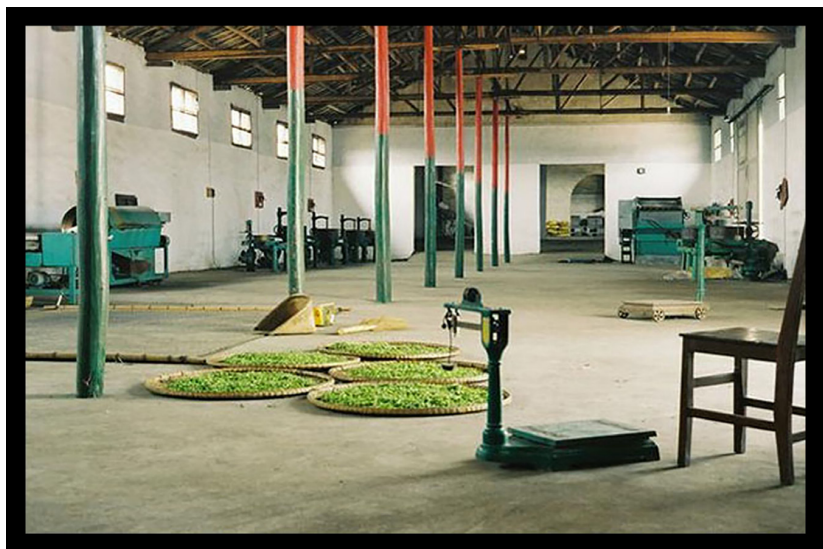
漓江，二〇〇五



武汉，二〇〇五



澳门，二〇〇五



赵李桥，二〇〇五



羊楼洞，二〇〇五



深圳，二〇〇五



赤壁，二〇〇五



漓江，二〇〇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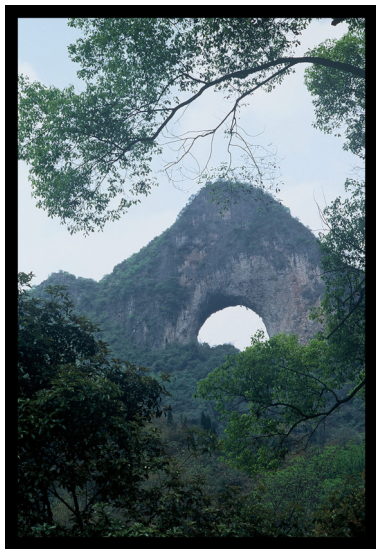
羊楼洞，二〇〇五



羊楼洞，二〇〇五



赤壁，二〇〇五



阳朔，二〇〇五



深圳，二〇〇五



赤壁，二〇〇五



滴江，二〇〇五



武汉，二〇〇五



赤壁，二〇〇五



阳朔，二〇〇五



赤壁，二〇〇五



武汉，二〇〇五



阳朔，二〇〇五



漓江，二〇〇五



赤壁，二〇〇五



澳门，二〇〇五



香港，二〇〇五



澳门，二〇〇五



香港，二〇〇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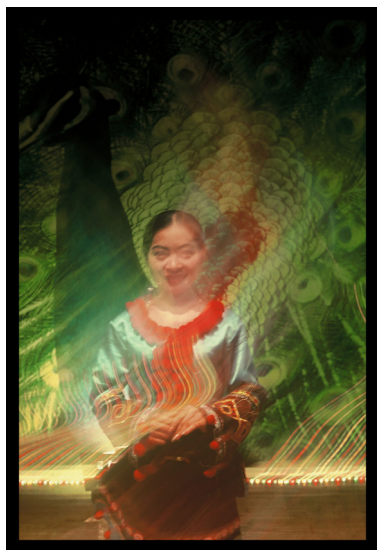
漓江，二〇〇五



羊楼洞，二〇〇五



武汉，二〇〇五



赤壁，二〇〇五



羊楼洞，二〇〇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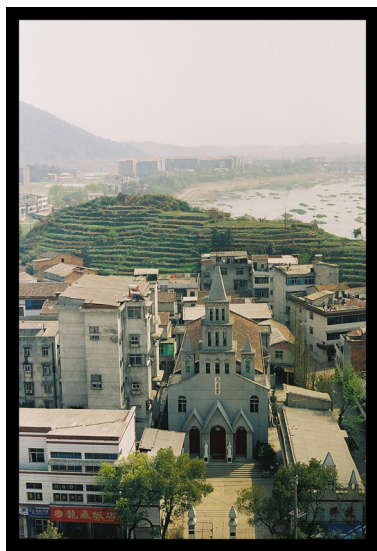
赤壁，二〇〇五



漓江，二〇〇五



漓江，二〇〇五



赤壁，二〇〇五



赵李桥，二〇〇五



深圳，二〇〇五



香港，二〇〇五



赤壁，二〇〇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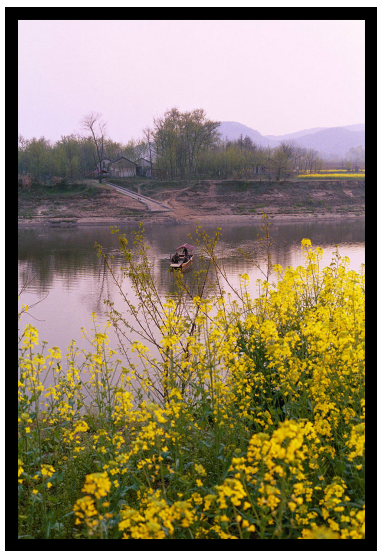
香港，二〇〇五



赤壁，二〇〇五



澳门，二〇〇五



赤壁，二〇〇五

注释

1 居伊·德波 (Guy Debord) , 《病态的星球》 (*La planète malade* , 巴黎, 2004 年) 。

2 伊恩·科贝恩 (Ian Cobain) 与亚当·拉克 (Adam Luck) , “源自中国死刑犯皮肤的美容产品” , 《伦敦卫报》 (*London Guardian*) , 2005 年 9 月 13 日。

3 中国劳工通讯 (China Labor Bulletin) , “电子垃圾处理工人的困境” , 2005 年 8 月 15 日。

4 曾湘泉等, “转型期的工时: 中国标准化与灵活化的双重任务” , 国际劳工组织 (日内瓦, 2005 年) 。

5 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2005 年《世界概况》 (*World Fact Book*) 将失业状况描述为: “城市地区为 9.8% ; 农村地区存在严重的失业和就业不足现象; ……一份中国官方期刊估计 2003 年的总体失业率 (包括农村地区) 为 20% (2004 年估算数据) 。” 与此同时, 中国新闻网

(Chinanews.cn) 2005 年 5 月 25 日刊登的一篇题为《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文章指出, 中国社会的官方平均失业率为 6.1%。鉴于中国人口基数巨大, 即便失业率只有微小差异, 也意味着涉及数以亿计的人口; 因此, 我不会贸然声称中国有 1.7 亿失业人口——毕竟仅农村地区的失业人数就可能超过这一数字。

6 Michael Sheridan (迈克尔·谢里丹) 。"China's hidden trade in children" (中国隐秘的儿童买卖交易) 。《星期日泰晤士报》 (Sunday Times) , 2005 年 9 月 25 日。

7 Beth Burwinkel (贝丝·伯温克尔) 。"The Great Wall" (长城) 。《肯塔基信使日报》 (Kentucky Courier-Journal) ，日期不详。

8 Louis Uchitelle (路易斯·乌奇特尔) ，"When the Chinese Consumer Is King" (当中国消费者成为“上帝”) ，《纽约时报》 ，2003 年 12 月 14 日。位于东莞的华南 MALL (South China Mall) 是全球最大的购物中心；到 2010 年，全球十大购物中心中将有七个位于中国。行业报告还显示，射频识别 (RFID) 设备市场正在迅速扩张，该技术很可能随后应用于身份证件及消费品领域，从而让某些痴迷于此的资本家能够掌握“谁拥有什么”以及“物品身在何处”等信息。

9 Jonathan Watts (乔纳森·瓦茨) ，"Suicide blights China's young adults" (自杀阴影笼罩中国年轻人) ，《卫报》国际版 (Guardian International) ，2005 年 7 月 26 日。

10 Worldwatch Institute (世界观察研究所) ，*Vital Signs* (《关键指标》) (华盛顿，2005 年) 。

11 参见第二部分“反污染抗议活动”小标题下的内容。

12 由于大坝建设和环境污染，迁徙的野鸭不得不与家畜争夺资源；在接触过程中，H5N1 病毒传播给了家畜，进而由家畜传染给人类。作为应对措施，当局在 2004 年对禽类进行了大规模扑杀。

13 参见第一部分“工人的苦难与死亡”小标题下的内容。

14 Philippe Arbaizar 等著，《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其人、其影与世界》 (伦敦，2003 年) 。

15 《中国日报》，“北京采取措施控制私家车数量”，2005年4月4日。

16 新华社，“专家警告：到2010年中国收入差距将达临界点”，2005年8月22日。一个收入研究专家小组设计了一套颜色编码预警系统来预测趋势。目前处于黄色预警状态，但可能进入红色区域；红色区域意味着“差距完全不可接受”并威胁社会稳定。

17 国际金融公司（IFC），“IFC发布关于中国私营部门的首份分析报告”，2000年10月18日；另见China.org，“私营部门：增长的支柱”，2004年3月10日；另见China.org，“非国有部门的发展”，2003年11月7日。

18 英国、欧盟、新西兰、澳大利亚等。

19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2005年世界概况手册》（在线版）。

20 刘莉，“河流污染，饮用水受染”，《中国日报》，2005年6月30日；另见魏武、单春刚，“中国将采取新举措实现环境目标”，新华社，2005年6月29日。

21 Watts，前引书。

22 Michael Elliot，“中国的新革命”，《时代周刊》，2005年6月27日——文中展示了零售额、手机拥有量、汽车拥有量及飞机起飞架次的稳步增长。

23 新华社，“温家宝总理强调构建和谐社会”，2005年3月5日；新华社，“胡锦涛：构建和谐社会对中国进步至关重要”，2005年6月26日。

24 对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网站上伊丽莎白·伊科诺米（Elizabeth Economy）的采访。

- 25 BBC 新闻，2005 年 8 月 8 日；另见穆尔·迪基（Mure Dickie）的文章《中国深层采煤导致每日 15 人死亡》（"15 deaths a day as China digs deep for coal"），2004 年 12 月 21 日。
- 26 J. 塔卡拉（J. Takala），《导言报告：体面劳动——安全劳动》（"Introductory Report: Decent Work - Safe Work"），国际劳工组织（日内瓦，2005 年）。
- 27 采访梁国雄（Leung Kwok Hung）；2005 年 6 月。
- 28 汪晖，《中国新秩序》（*China's New Order*）（剑桥，2003 年）。
- 29 吉姆·亚德利（Jim Yardley），《中国农村发生骚乱，警方试图阻止抗议污染活动》（"Riot in Rural China as Police Try to Halt Pollution Protest"），《纽约时报》，2005 年 4 月 14 日。
- 30 霍华德·弗伦奇（Howard French），《中国的新前沿：民主与异议的考验》（"China's New Frontiers: Tests of Democracy and Dissent"），《纽约时报》，2005 年 6 月 19 日。
- 31 Audra Ang，“中国工厂抗议活动致数十人受伤”，美联社，2005 年 8 月 21 日；美国之音，“中国东部爆发反污染抗议活动”，2005 年 8 月 25 日。
- 32 Edward Cody，“中国日益高涨的抗议浪潮波及党内官员”，《华盛顿邮报》，2005 年 9 月 12 日。
- 33 Edward Cody，“中国网络空间里迸发出的激情”，《华盛顿邮报》，2005 年 7 月 19 日。

- 34 Echo Shan, “中国：狂野派对与群交活动玷污了长城”，《亚洲性爱公报》（Asian Sex Gazette），2005年8月12日。
- 35 Jean Francois Billeter, 《庄子之课》（巴黎，2001年）；同作者，《庄子研究》（巴黎，2004年）。
- 36 Len Bracken, 《辩证享乐主义》（华盛顿，2003年）。
- 37 Paul Lafargue, 《懒惰权》（Ardmore, 1999年）。
- 38 Billeter, 前引书。
- 39 Elliot, 前引书。
- 40 世界银行, “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2005年7月15日。
- 41 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中国：巨大的可能性与现实》（纽约，2005年）。
- 42 CIA（中央情报局），前引书。
- 43 《中国日报》（香港版），“内地顺差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2005年7月13日。
- 44 人民网, “欧盟叫停中国毛衣进口”，2005年7月23日。
- 45 关于童工和监狱劳工的数据不可靠；这些数字属于保守估计。
- 46 路透社, 《中国6月贸易顺差激增五倍》，2005年7月11日。
- 47 世界观察研究所（WorldWatch Institute），同前引。
- 48 哈耶特·塞拉米（Hayet Sellami），《中国的电力部门：能源告急！》，《中国国际商业》（China International Business），2005年4月1日。
- 49 Nayan Chanda, “Crouching Tiger, Swimming Dragon”（卧虎游龙），《纽约时报》，2005年4月11日。
- 50 Elizabeth Economy, 前引文。

- 51 Philip Thornton, “Global savings imbalance could force rates higher” (全球储蓄失衡可能迫使利率上升), 《独立报》, 2005 年 9 月 15 日; Laura D'Andrea Tyson, “What CNOOC Leaves Behind” (中海油留下了什么), 《商业周刊》, 2005 年 8 月 15 日; 另见《人民日报》, “未来五年预计将发生一万起大型并购交易”, 2003 年 11 月 20 日。
- 52 Mike Dolan, “The whereabouts of China's currency stash” (中国货币储备的去向), 路透社, 2005 年 6 月 20 日。
- 53 同上。
- 54 同上。
- 55 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国际清算银行 (BIS) 报告以及格林斯潘 (Greenspan) 和萨默斯 (Summers) 讲话的广泛报道——后者在描述“坑害世界”和“世界坑害我们”这两种情境时尤为直言不讳。
- 56 Bruce Stannard, “Dumping of US dollar could trigger 'economic September 11'” (抛售美元可能引发“经济版 9·11”), 《澳大利亚人报》, 2005 年 8 月 29 日。
- 57 <http://www.engerhealth.org/ia/cbc/china.html>
- 58 David Eimer, “China admits women were forced to have abortions” (中国承认曾强迫妇女堕胎), 伦敦《独立报》, 2005 年 9 月 21 日。
- 59 CIA (中央情报局), 前引文。
- 60 Zeng, 前引文, 第 1 页。
- 61 Zeng, 前引文, 第 2 页, 表 1.1。

- 62 Zeng, 前引文, 第 4 页。
- 63 Zeng, 前引文, 第 12 页, 表 2.6。
- 64 Zeng, 前引文, 第 4 页, 注释 4。
- 65 Takala, 前引书, 第 6 页, 表 2。
- 66 Takala, 前引书, 第 7 页, 表 3。
- 67 Takala, 前引书, 第 6 页, 表 1。
- 68 Marwaan Macan-Markar, “只有增长, 没有就业” (All growth, no jobs), 《亚洲时报》 (Asia Times), 2005 年 9 月 3 日。
- 69 Tim Luard, “中国的 ‘改革’ 工作计划” (China's 'reforming' work programme), BBC 新闻, 2005 年 5 月 11 日。
- 70 Keith Bradsher, “中国即将成为世界下一个主要汽车出口国” (China Looms as the World's Next Leading Auto Exporter), 《纽约时报》, 2005 年 4 月 22 日。
- 71 Schell 著有九本关于中国的书——《迪斯科与民主》 (Discos and Democracy) 和《致富光荣》 (To Grow Rich Is Glorious) 是其中包含这一警示的两部著作。
- 72 新华社, “环境问题是首要关切” (Environmental issue a top concern), 2005 年 8 月 2 日。
- 73 《经济学人》, “一道巨大的垃圾长城” (A great wall of waste), 2004 年 8 月 19 日。
- 74 English.eastday.com, “可能出现环境危机”, 2005 年 6 月 20 日。
- 75 新华社, “污染企业和矿山被关闭”, 2005 年 6 月 24 日。
- 76 新华社, “污染对贫困人口构成严重威胁”, 2005 年 7 月 23 日。

- 77 新华社，“污染对贫困人口构成严重威胁”，2005 年 7 月 23 日；另见 CIA，前引文献。
- 78 《经济学人》，前引文献。
- 79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视野”（China Horizons），2005 年 5 月 18 日。
- 80 新华社，“四年间发生 3988 起水污染事故”，2005 年 6 月 29 日。
- 81 新华社，“河流受污染，饮用水遭破坏”，2005 年 6 月 30 日。
- 82 世界卫生组织。
- 83 Billeter，前引文献。
- 84 Yardley，前引文献。
- 85 Ang，前引文献。
- 86 国际绿色和平组织。
- 87 Edward Cody，“中国日益高涨的抗议浪潮波及党政官员”，《华盛顿邮报》，2005 年 9 月 12 日。
- 88 Perry Link，“中国：抹杀真相”，《纽约书评》，2005 年 2 月 24 日。
- 89 同上。
- 90 路透社，“中国制定互联网新闻新规”，2005 年 9 月 25 日；另见：Audra Ang，“北京诊所治疗网瘾患者”（Beijing Clinic Treats Online Addicts），美联社，2005 年 7 月 3 日。
- 91 例如，陈桂棣与吴春桃所著的《中国农民调查》以及何清涟所著的《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
- 92 中国新闻网，“中国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10%”，2005 年 1 月 6 日。

- 93 新华社，《中国 8 亿农民将免缴农业税》，2005 年 6 月 29 日。
- 94 新华社，《中国农民通过“板凳会”参与村务决策》，2004 年 12 月 17 日。
- 95 《经济学人》，《化犁为杖》（Turning ploughshares into staves），2005 年 6 月 25 日。
- 96 新华社，《论坛聚焦和谐家庭》，2005 年 8 月 19 日；新华社，《“幸福工程”援助贫困农村母亲》，2005 年 8 月 18 日。
- 97 Watts，前引书。
- 98 《经济学人》，《中国的土地纠纷》，2005 年 6 月 23 日。
- 99 新华社，《“白领”如今不再是热门称谓》，2005 年 6 月 25 日。
- 100 Richard McGregor，《中国组建反恐特遣队》，《金融时报》，2005 年 8 月 18 日。
- 101 Watts，前引书。
- 102 Joseph Kahn，《中国的“富裕阶层”激怒“贫困阶层”引发暴力》，《纽约时报》，2004 年 12 月 31 日。
- 103 Elliot，前引书。
- 104 John Ridding，《渴望品尝自由的多种滋味》，《金融时报》，2005 年 4 月 10 日。
- 105 采访当地导游及旅游网站信息。据 MonkeyPeaches 网站消息，吴宇森将执导电影《赤壁之战》，剧本由邹静之撰写，梁朝伟和渡边谦主演。
- 106 《李白与杜甫》（伦敦，1973 年）。

107 《情色之魂》（The Erotic Spirit），Sam Hamill 编（波士顿，2003 年）。

108 张若兰（Olan Chang），《爱与性之道》（纽约，1977 年）；同上，《爱侣之道》（纽约，1983 年）

精选参考文献

Billeter, Jean François. Leçons sur Tchouang-Tseu. Paris: Éditions Allia, 2004.

Chang, Jolan. Tao of Love and Sex. New York: Plume, 1977.

Idem. Tao of the Loving Couple. New York: Plume, 1983.

Chuang Tzu. Chuang Tzu Basic Writings. Translated by Burton Wat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4.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China! Inside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72.

Confucius. The Analects. Translated by D.C. Lau.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1979.

Doumet, Christian. Passage des oiseaux phis: photographes de Chine de Victor Segalen. Cognac: Le temps qu'il fait, 1996.

Fewsmith, Joseph. China Since Tiananmen.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Fung, Yu-Lan. The Spirit of Chinese Philosop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2.

Hinton, Harold. China's Turbulent Quest: An Analysis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949. Don Mills, Canada: Fitzhenry and Whiteside, Ltd., 1973.

Hsi, Hsuan-wou and Reeve, Charles. Bureaucratie, bagnes et business. Montreuil, France: Éditions L'insomnie, 1997.

Huang, Yasheng. Selling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the Reform Er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I Ching. Translated by Raymond Van Over.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1.
- Kissinger, Henry.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4.
- Kristeva, Julia. Des Chinoises. Paris: Éditions Des femmes, 1974.
- Lao Tzu. Tao Te Ching. Translated by D.C. Lau.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1963.
- Leung, Edwin Pak-Wah. Political Leaders of Modern China: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2.
- Lieberthal, Kenneth.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New York: W.W. Norton, Inc., 2004.
- Li Po and Tu Fu. Translated by Shui Chein-tung and Arthur Cooper.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1973.
- Mao, Tsetung. Quotations From Mao Tsetu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2.
- Meisner, Maurice.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9.
- Schell, Orville. To Get Rich Is Glorious: China in the Eightie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 Segalen, Victor. Oeuvres complètes. Paris: Éditions Robert Laffont, 1995.
- Schoppa, R. Keith. Revolution and Its Past: Identities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New York: Prentice Hall, NY, 2002.
- Schram, Stuart. Mao Tse-Tung.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Ltd., 1966.
- Terrill, Ross. *800,000,000 The Real China.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72.

The Taoist I Ching. Translated by Thomas Cleary. Boston: Shambhala, 1986.

Tsai, Kellee. Back-Alley Banking: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We Will Always Remember Premier Chou En-Lai.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7.

索引

本索引为本中文自由流通版的选择性索引；页码采用本版书页编号。

- 居伊·德波 v,x,125
- 让-弗朗索瓦·比莱特 10
- 邓小平 v,vi,5,6,9,10,13,20,21,22,37,50
- 毛泽东 v,vi,5,9,11,20,42,43,51,56
- 周恩来 v,vi,5
- 胡锦涛 7,37,38,50,58,127
- 温家宝 7,127
- 赵紫阳 8,51,52,53,54,55,59
- 华国锋 5
- 梁国雄 7,128
- 李白 x,41,42,43,46,133
- 庄子 ix,x,7,9,10,11,129
- 卡尔·马克思 11
- 北京 vii,2,4,5,8,13,15,22,25,33,36,46
- 香港 viii,xii,2,3,4,5,7,8,12,21,49,50
- 澳门 2,3,11,36,57,101,103,114,115,123
- 深圳 viii,2,3,21,22,35,51,100,105,108,121
- 武汉 2,3,29,30,31,32,40,41,99,100,103,110
- 赤壁 viii,ix,2,3,10,28,40,88,90,91,92,98
- 济南 2,6,11,27,30,61,64,68,71,72,74,76
- 泰山 2,3,6,21,64,67,75,80,82
- 阳朔 2,23,31,32,40,43,91,92,93,94,95,97
- 桂林 2,3,23,44,49,89
- 漓江 3,23,24,43,45,46,90,93,95,96,97,98
- 台湾 2,3,16,46,47,50,56,59
- 文化大革命 v,5,50
- 民主墙 2,6,50,51,55,62
- 四个现代化 v,vi,5,6,28,50
- 红色资本 vi,vii,1,4,7,8,12,13,14,15,16,29
- 和谐社会 7,37,58,127
- 中国共产党 4,6,51